

從近代動物品種觀探討 臺灣本土犬隻的被認識與命名*

鄭麗榕**

摘要

2015 年「世界畜犬聯盟」(Federation Cynologique Internationale, FCI) 通過認證「臺灣犬」(Taiwan Dog) 為該聯盟第 348 種純種犬 (purebred dogs, pedigree dogs)，明文訂定其標準。臺灣犬命名的故事其背景是這一百多年來國際間純種犬制度化的歷史，也與日治至戰後以來，官方與民間對臺灣地方犬隻的調查、記錄甚至血統改變有關，並在臺灣的政治社會經濟發展等外在情勢演變下完成命名。

動物純種血統觀、現代犬的創造，受西方近代國家與社會影響很深。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大量引入洋犬，日治時期臺灣也於 1910 年代開始受純種犬觀念影響，使用洋犬為搜索犬，本土犬也被管理、記錄、評價。1930 年代開啟臺灣本土犬隻初步調查，但因漸進入戰爭時期，重視洋犬為主的軍犬。及至 1980 年代，因日本研究者來臺調查臺灣本土犬隻以尋求「日本犬」淵源，才更全面地看到臺灣本土犬隻，並在臺灣本土化的時代背景以及商業逐利氣氛下，完成了「臺灣犬」的國際命名申請。

在日治時期雖已有畜犬專家引入相關品種觀，但都是較零星的想法，且主要置於軍事、保育脈絡，並且都由日人發聲，缺乏在地觀點。而戰後 1960 年代雖同因日本人在臺作犬隻調查而開始關注臺灣本土犬隻，但漸由臺灣當地人士參與，且與政治、社會、經濟背景息息相關，其歷程也反映了臺灣歷史不同階段的發展。

從國族角度來回顧臺灣本土犬隻被認識的歷史，會更進一步發現，在不同時期，相異國族基於各自標準，對臺灣本土犬隻評價不一，但也一致地反應了其心目中的族群中心觀。

關鍵詞：臺灣犬、本土犬、動物命名、現代犬、動物品種觀、國族認同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純種犬的誕生：臺灣犬的前世與今生」成果 (MOST109-2410-H-004-153-)。感謝匿名審查委員們在觀念、史料、方法上不吝提出指正，獲益良多；承蒙龔玉玲、龍緣之、鄭安晞、李鑑慧、張素玢、蔣竹山、呂紹理等教授提供意見，助理李京屏、許玉欣協助資料收集，謹致謝忱。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22 年 8 月 26 日；通過刊登：2022 年 9 月 27 日。

- 一、前言
 - 二、近代西方新興的狗文化
 - 三、近代之前及日治初期對臺灣犬隻的紀錄
 - 四、日治中期對臺灣犬隻的初步調查與紀錄
 - 五、戰後對臺灣本土犬隻的調查及完成命名
 - 六、結論
-

一、前言

2015年「世界畜犬聯盟」(Federation Cynologique Internationale, FCI)通過認證「臺灣犬」(Taiwan Dog)為該聯盟第348種純種犬(purebred dogs, pedigree dogs),明文訂定此一品種的外觀、行為、個性等標準,並認定「臺灣犬」原是臺灣本土犬隻,屬南亞獵犬後裔,過去與臺灣原住民居住於中部山區。¹「臺灣犬」的命名完成,象徵國際畜犬組織認證了臺灣代表性犬隻的標準化、規格化成果,而這項標準化、規格化主要是由臺灣本地獸醫、育犬業者等主導提出申請。然而在此之前,人們對臺灣本土犬隻實有多種不同的想像與描述,也反映了不同時期此地人們與狗的關係。特別是日治以來,官方與民間對於生活在臺灣犬隻的紀錄、利用甚至品種改良的企圖散見各方文獻,其變化過程也受臺灣的政治社會經濟發展等外在情勢變化影響,可以說是一段值得探究的「狗的近代臺灣史」。

這段近代有關狗的歷史,與日治時期傳入的動物血統/品種概念在臺灣的實踐有關。在這之前,人們對犬隻的觀察多偏重在其功能、利用方式,而不重視狗

¹ 依「世界畜犬聯盟」(Federation Cynologique Internationale, FCI)的資料,臺灣犬是臺灣本土的中型犬種,可作為獵犬、警戒犬與陪伴犬,屬於南亞獵犬的後裔,主要特徵包含細尖耳、杏仁眼、三角型頭部和鐮刀狀尾巴。“Taiwan Dog (348)”,「世界畜犬聯盟」(Federation Cynologique Internationale, FCI),下載日期:2019年12月1日,網址:<http://www.fci.be/en/nomenclature/TAIWAN-DOG-348.html>;林星輝,《臺灣國寶犬》(臺北:培琳出版社,1994),頁4。

的血統與其呈現的外觀，尤其是形狀、大小、毛色等。這套狗的新分類觀主要於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發展出來，源自英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新的分類甚至以數字化方式確立其血統／品種標準，並隨西方帝國勢力發展而影響全世界。在本文中，將這一套新的評價及其運作方式，稱為新興狗文化（詳見第二節）。臺灣大致在日治之後，尤其二十世紀初，因獵犬、警犬等的使用，而開始傾向以血統來評價及觀察犬隻，評價與觀察所留下的紀錄，本文概以「認識」名之。兩次大戰期間，日本殖民者以血統、品種觀念為核心，曾計畫在臺灣培育適合本地風土的狗以供在地軍事利用。因此，本文的「近代」，主要係以日治為重要的起始點，但之前少量零星有關狗的紀錄，仍有其比較的參考價值。緣此，本文擬就臺灣社會文化史角度，從近代的血統／品種觀，就西方新興的狗文化談起，粗略回顧日治之前零碎而非歷史核心的犬隻描述，以及日治之後，在新觀念影響下，不同階段的臺灣本土犬隻如何被相異人群所記錄、調查以至於命名、改變，從而探究其中人犬關係變遷的歷程。² 其中所謂社會文化史角度，是指受到近代血統、品種新觀念影響，在不同階段的時代背景下，從國家到社會對於犬隻的觀察與評價產生變化，特別是犬隻商品化後，專業者培育、命名臺灣犬的努力，呈現出臺灣民間社會與媒體報導對臺灣犬隻新的看法。

本文研究領域涉及動物史、自然史、環境史，也與臺灣社會文化史有密切關係。過去有關臺灣狗的歷史研究偏重於近代國家的犬隻治理及人們的觀念對臺灣本土犬的影響，其中犬隻品種觀並不是一個受到關注的議題。較早以臺灣犬隻為題的歷史研究可能見諸於吳政憲，雖未觸及品種問題，但有助吾人了解臺灣的犬隻管理進入近代日本殖民者視線的前因後果。他探討日治初期臺灣流浪狗的處境，政府為了對付狂犬病而掃蕩流浪犬，以來福槍進行「全滅」政策，官方並對家飼犬課稅。³ 李若文亦曾探討日本殖民時期，臺灣家犬觀念與野犬撲殺的歷史，

² 本文以生活在臺灣的犬隻為主要研究對象，名詞界定可能不是很容易，但文中臺灣本土犬大致指生存於臺灣地方的狗，特別是指本地原生種，與近代大量移入的洋犬對稱；當然，這是觀念上的指涉，因為要證明一隻狗有沒有與洋犬混種並不是很簡單的事。而本文所稱「臺灣犬」，行文中則可能是援引犬類著作裡所指臺灣地方的犬隻，2015年正式命名的純種犬名稱亦使用此專有名詞。

³ 吳政憲，〈飄泊悲歌：臺灣流浪狗之研究（1895-1910）〉，《臺灣人文》（臺北）5（2000年12月），頁219-245。

並為野外以臺灣本土犬為主的犬隻遭受滅絕劫難深感不平。⁴ 另外，龔玉玲曾以「狂犬、名犬、流浪犬」三個方向，研究現代國家與社會如何看待狗的生物性，龔文中觸及純種犬的討論不少，亦為本文重要參考；然該文名犬部分較偏重進口臺灣的洋犬，而少及於臺灣本土犬隻的實際案例。⁵ 此外，簡好儒以寵物商品化為題，處理1950年代臺灣純種犬市場的發展歷史，尤其探討深受日本影響的臺灣畜犬協會，其登錄純種犬、發行血統書、登錄繁殖犬舍、舉辦犬展等運作過程，正是早期臺灣育犬界形成的歷史圖像，雖然也以洋犬案例為主，但當時犬界建構的純種犬認證流程，也是解嚴前後推動臺灣代表性純種犬命名的重要背景。⁶ 再者，臺灣原住民族與臺灣本土犬隻關係密切，是狩獵中的好伙伴，美國人類學家 Scott Simon 即曾利用人狗相互馴化及多物種民族誌的概念，從深層文化觀念探討賽德克族與狗的關係，特別是獵人與狗的緊密聯結；他的研究揭示，賽德克族認為狗具有自主意識（族人視為「真正的狗」），可選擇其朋友、伴侶，捆綁狗被認為是殘忍的，因此族人不作選擇性育種，呈現出與近代寵物文化（讓狗進屋且住在其中）大異其趣的人狗關係。⁷ Simon 所描述的賽德克族放養犬的觀念，對於本文思考後來學者在臺灣山區進行本土犬隻調查，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品種觀的發展與動物育種歷史相關，有關狗之外其他馴化動物（動物育種）的文化史研究，也可以作為本文參考。如林欽傑研究日治時期臺灣馴化馬的歷史，提及日本人殖民臺灣時，參採了源自歐洲的「熱帶風土馴化」概念，對當時官方規劃日本移民事業，以及思考外來動植物如何適應臺灣本地有所影響，⁸ 此一研究有助於本文解讀日治時期文獻中，有關軍方獸醫提出構想，思考如何在臺灣利用犬隻混種，以培育出適合本地的理想軍警用犬。

⁴ 李若文，〈殖民地臺灣的家犬觀念與野犬撲殺〉，《中正歷史學刊》（嘉義）21（2018年12月），頁31-71。

⁵ 龔玉玲，〈狂犬、名犬、流浪犬：臺灣現代社會如何面對狗的生物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⁶ 簡好儒，〈寵物商品化與價值變遷：分析1950年代後犬市場的形成與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⁷ Scott Simon, "Real People, Real Dogs, and Pigs for the Ancestors: The Moral Universe of 'Domestication' in Indigenous Taiw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Hoboken) 117: 4 (Dec. 2015), pp. 695-709.

⁸ 林欽傑，〈馬與人交會的臺灣史：以輸入馬的風土馴化與利用層面為中心（1630-1945）〉（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謝予騰利用口傳文學與神話及相關研究，粗略整理了少部分荷蘭、清代、日治以來的文獻，觸及臺灣犬隻品種、外觀歷史紀錄，推論出《後漢書》記錄的夷洲犬非臺灣犬隻，對史料的使用亦稍簡要，主要關懷為古地名與臺灣的關係，也與本文有異。⁹

而近代日本帝國中犬族歷史的相關研究，則為本文提供了臺灣殖民地犬隻歷史的大背景與比較視野。較重要的相關英文研究著作有美國 Aaron Herald Skabelund 的專書，作者的核心關懷是日本帝國如何在狗的事務上進行所謂「文明化」措施，除狂犬病相應撲殺、管理措施，另亦包括複製其種族觀到日本內地與殖民地的狗隻上；書中也討論了日本犬保存運動、寵物的歷史等，可提供本文背景分析參考。另外日文出版品中，有不少以狗的日本史、狗的現代史、狗的明治維新史等為名者，且有專以日本代表性犬隻——如秋田犬等日本純種犬為題的犬學著作，亦是本文不可忽視之前人成果。¹⁰

另一方面，本文也注意到英文著作中關於西方純種犬的研究成果，最早在 1980 年代，Harriet Ritvo 即以英國的動物觀為題，探討維多利亞時期英國人與其他造物的歷史，研究動物展覽與血統分類、有關動物的疾病控制、動物園與狩獵問題等，強調人類社會階級、國家對動物與環境的影響。¹¹ 近著則有 Michael Brandow 有關育種問題的研究，以及 Michael Worboys、Julie-Marie Strange 和 Neil

⁹ 謝予騰，〈夷洲是否為臺灣古地名再論：關於犬尾與犬毛〉，《成大中文學報》（臺南）72（2021 年 3 月），頁 79-110。

¹⁰ Aaron Herald Skabelund, *Empire of Dogs: Canines, Jap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mperial Worl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日本犬歷史相關者，如川西玲子，《戰時下の日本犬》（東京：蒼天社，2018），該書處理了 1920 年代起日本犬保存運動的始末以及戰爭對日本犬的影響。又如仁科邦男，《犬たちの明治維新：ポチの誕生》（東京：草思社，2014），探討明治維新後，西力進入日本，對日本家養犬（尤其是犬隻管理制度及寵物文化）產生的重大影響。谷口研語，《犬の日本史：人間とともに歩んだ一万年の物語》（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對日本史中的人犬關係提供較長時段且廣泛普遍的觀察，包括與血統論相關的日本在來犬保存運動。日本戰後創刊的愛犬者雜誌《愛犬の友》有長達 68 年的歷史（1952-2020），在 1960 年代出版了一些由獸醫、純種犬繁殖業者、畜犬協會等撰筆的日本犬讀本，提供純種犬專業人士的詳細作業規範及標準，可作為內部觀點參考。如：愛犬の友編集部編，《日本犬中小型讀本》（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61），以及愛犬の友編集部編，《改訂秋田犬讀本》（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67 年第 5 版）。

¹¹ Harriet Ritvo,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同樣在 1980 年代，以維多利亞時期英美人士對動物的態度及觀念為題的研究尚有 James Turner, *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Animals,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Victorian Mind*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emberton 有關維多利亞時代現代狗的發明之論著，前者以社會批評的角度探討動物純種崇拜的歷史；後者具有深度的社會文化史內涵，以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動物繁殖業者如何創造「現代狗」為主軸，討論他們何時、何地、為什麼以及如何運用現代方式訂製與繁殖狗。這些著作對於本文說明近代傳入的新興狗文化均有所助益。¹²

綜合言之，與本文相關之前人研究不少，但其中尚乏直接以血統觀、現代犬隻調查及血統重塑為中心，來探討臺灣本土犬隻標準的形成，為本文留下很好的研究空間。

在關鍵核心史料上，本文主要利用日治以來報紙期刊、部分檔案、書籍出版品，其中有關犬隻的資料數量龐大，但本文儘量以近代動物品種觀為觀察核心，從中過濾出較可掌握並予以分析的史料。¹³ 有些上世紀末出版的著作兼具史料性質，如1994年犬界人士林星輝所著《臺灣國寶犬》一書，收錄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臺灣畜犬組織製作的重要原始史料，可藉之探究「臺灣犬」命名過程標準書內容的時代變遷。¹⁴

二、近代西方新興的狗文化

依近代生物學分類，家犬的學名是 *Canis lupus familiaris*，¹⁵ 亦即在生物學中，所有家犬屬於同一品種。但近代社會中影響人狗關係極為深遠的，是前述形塑全

¹² Michael Brandow, *A Matter of Breeding: A Biting History of Pedigree Dogs and How the Quest for Status Has Harmed Man's Best Friend* (Boston: Beacon Press, 2015); Michael Worboys, Julie-Marie Strange, and Neil Pemberton,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Dog: Breed and Blood in Victorian Britai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¹³ 審查人提示，《臺灣日日新報》中有關狗的資料非常多。若以「犬」為關鍵字搜尋，在大鐸版可得 5,469 筆，漢珍版則有 6,321 筆，數量驚人，是很豐富的狗歷史研究素材。但若以「蕃犬」搜尋，則大鐸版僅 12 筆，漢珍版有 29 筆，然多數與蕃地征服討伐或公共衛生疾疫相關。而以「臺灣犬」搜尋，則僅 3 筆。由於數量龐大，實質上無法每筆檢視。但從大致來看，多數報導與狂犬病防治、軍犬活動相關，也常涉及洋犬而較少與本土犬隻相關，筆者僅能在助理協助下，儘量找出與品種相關者，掛漏之處在所難免，敬祈包涵指正。

¹⁴ 林星輝，《臺灣國寶犬》，頁 58-71。

¹⁵ 'Canis lupus familiaris,' "Animal Diversity Web," accessed 1 Aug. 2022; available from https://animaldiversity.org/accounts/Canis_lupus_familiaris/.

球新興狗文化的純種血統觀，這是十九世紀下半以後從英國逐漸發展出來對犬隻的分類方式，在觀察、記錄及評價犬隻上建立一套完整體系，並傳至全球各地，影響到許多地方人們對犬隻的認知。

從1859年英國首次舉行犬展，不到十年間犬隻俱樂部如雨後春筍陸續成立，不斷演化出各種評賞標準，1873年英國育犬協會編列出第一本純種犬血統書，提供純種犬重要的身分證明。¹⁶ 在此之前，人們原僅從功能的角度評價犬隻，區別其為獵犬、工作犬（如牧羊犬）、猛犬、害犬等；¹⁷ 而此一新興狗文化則是加上品種為重要評價標準，根據犬隻的形狀、大小、皮毛和顏色來定義其品種，研究者稱之為現代犬的創造；人們將狗的類型標準化、規格化，常以育種來控制犬隻外型。¹⁸ 英國在其國力鼎盛時期，透過跨國貿易將這種新興狗文化傳播到歐陸、美洲及全世界。¹⁹ 幾乎與此同時，全球寵物時代（Age of the pet）也開始降臨，²⁰ 許多純種犬被奉為特殊階級的珍寶。²¹

以英國為主的歐美大國幾乎壟斷了當時純種犬的認證流程與結果，從歐美發展出的犬隻標準成為全球犬隻標準，可稱為歐美中心主義的新興狗文化。二十世

¹⁶ 約翰·荷曼斯（John Homans）著、張穎綺譯，《狗：狗與人之間的社會學》（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頁192-197。

¹⁷ 加林·艾林格（Gavin Ehringer）著、趙越譯，《离开荒野：狗猫牛马的驯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頁50-51。

¹⁸ Michael Worboys, Julie-Marie Strange, and Neil Pemberton,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Dog: Breed and Blood in Victorian Britain*, p. 222.

¹⁹ 美國學者 Harriet Ritvo 以英國的動物觀為題，探討維多利亞時期英國人與其他造物的歷史，其中研究動物展覽與血統分類的歷史，可算是動物純種論研究的經典之作。Harriet Ritvo,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可參見其中第一部分有關牛隻與寵物的品種改造史。近著則有 Michael Brandow, *A Matter of Breeding: A Biting History of Pedigree Dogs and How the Quest for Status Has Harmed Man's Best Friend*。而2018年由 Michael Worboys 等人出版的著作，則更進一步深入探討十九世紀現代犬的創造歷史，是有關動物現代性議題較新且重要的史學研究成果。Michael Worboys, Julie-Marie Strange, and Neil Pemberton,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Dog: Breed and Blood in Victorian Britain*。

²⁰ 菲利浦·郝威爾（Philip Howell）著、李鑑慧譯，〈一個「全球的」寵物史會是甚麼模樣？〉，《成大歷史學報》（臺南）58（2020年6月），頁7。

²¹ 凱瑟琳·約翰斯（Catherine Jones）著、黃英譯，《狗：历史、神话、艺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頁16-17。文化評論者約翰·柏格（John Berger）也認為：「近代初期以來的動物畫……畫的不是自然狀態下的動物，而是家畜，畫家特別凸顯牠們的優良血統以證明牠們價值不斐，牠們的優良血統也能彰顯主人的社會地位。（畫動物就像在畫有四條腿的家具）」約翰·柏格（John Berger）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出版社，2010），頁119-120。

紀初全球性的犬隻組織成立後，雖將各國的特色犬都逐漸納入評價，但得到純種犬認證的狗仍以歐美國家為主，認為這些被認證的犬隻才是優良品種。1936年一張美國芝加哥出版商Judy Publishing Company (Dog World Magazine) 印製的各國狗圖中(圖一)，²² 可看到當時世界上164種純種犬，這些國家多集中於歐洲。其中大英帝國最多：英格蘭共有27種、蘇格蘭9種、威爾斯6種，而英國自治領加拿大、澳洲及愛爾蘭也都各5種，合計占當時全世界純種犬三分之一強；法國次之，有22種；德國17種；義大利8種；美國8種(不含阿拉斯加犬)；俄羅斯6種。亞洲國家裡中國有5種(另西藏3種)，²³ 日本才1種(小型寵物犬日本狆)。純種犬也常以歐美國家命名，如英國獵狐犬、德國牧羊犬、挪威獵鹿犬、愛爾蘭獵狐犬、洋基(指美國東北部)梗犬、法國貴賓犬等。²⁴ 可知在新興狗文化中，某種程度強調了犬隻與國家、區域的聯結。在以歐美中心主義評價犬隻的同時，這些歐美國家對於其殖民地犬隻則常抱批評的態度，多認為牠們不馴化、凶惡、野蠻且雜種，與他們認為的西方文明化犬隻為對比。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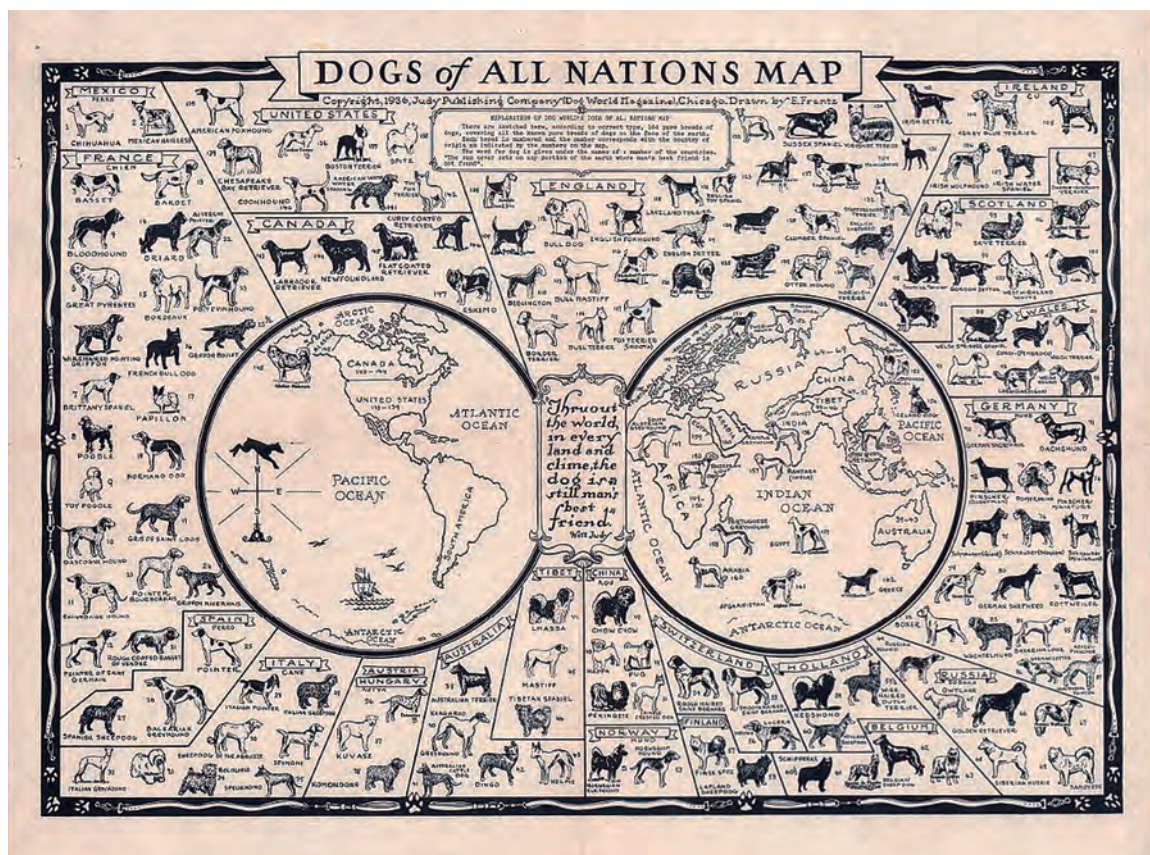
歐洲的英、法、德尤其是產製純種犬的主要國家，英國是創發國，對自然的改造不但有興趣，也實際付諸行動；法國則一向熱心於馴化動植物為人所用，甚

²² 這張圖未說明認證其中犬隻的組織名稱，但推想可能是1911年創立的全球性犬隻組織「世界畜犬聯盟」(FCI)。可與這張美國出版的狗地圖對照的是1933年於倫敦出版的世界狗圖(Dog Map of the World)，畫有64種純種犬以及各種犬的起源年代，畫中標明這些純種犬為美國畜犬協會所認可。參見“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 accessed 1 February 2022; available from https://www.davidrumsey.com/luna/servlet/detail/RUMSEY~8~1~290358~90061904:Dog-Map-of-the-World-?sort=pub_list_no_initialsort%2Cpub_date%2Cpub_list_no%2Cseries_no&qvq=q:dog%20map%20of%20the%20world;sort:pub_list_no_initialsort%2Cpub_date%2Cpub_list_no%2Cseries_no;lc:RUMSEY~8~1&mi=7&trs=8。Aaron Herald Skabelund 曾引用分析這張1933年出版的狗圖，認為它充分顯示歐美中心主義，中東、亞洲、非洲、南美等完全被邊緣化忽略。Aaron Herald Skabelund, *Empire of Dogs: Canines, Jap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mperial World*, p. 23 以及彩色頁圖第二張(無頁碼)。

²³ 各國狗圖中，中國的5種純種犬之一為獅子犬，亦即北京犬，其血統改造歷程其實與英國也相關。出身生物學的雜文家夏元瑜在批評純種犬對動物造成的傷害時，舉北京犬為例：「完全是卡通式的……，在生理學上可十分不便，第一牠的眼球，有一半生在頭骨之外，容易受損傷。第二頭太大。別看牠腿短又羅圈(兩前腿向內彎)，可跑起來，人還追不上。後來經過了庚子之亂，大批的北京狗流入英國，又到了日本。才被改造成現在這個樣子。」夏元瑜，〈大官奴才帽子說不完的狗年狗事〉，《中央日報》，1994年2月13日，第3版。

²⁴ Aaron Herald Skabelund, *Empire of Dogs: Canines, Jap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mperial World*, p. 24.

²⁵ Aaron Herald Skabelund, *Empire of Dogs: Canines, Jap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mperial World*, p. 20.



圖一 1936年各國狗圖

資料來源：‘Dog of all Nations Map,’ “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 accessed 28 March 2022; available from <https://www.davidrumsey.com/luna/servlet/detail/RUMSEY~8~1~272071~90045789>.

至組織學會推動。而德國擁有如Carl Hagenbeck般致力大動物血統改造的動物園經營者，為全球動物園經營帶來革命性的改變，且是出產狼犬最重要的國家，對軍犬的繁殖培育尤其積極。²⁶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大力西化，進口洋犬，逐漸傳入西方新興狗文化，同時西式的畜犬知識也透過專業休閒雜誌傳播；尤其十九世紀末休閒狩獵流行時期，在獵犬的需求下，畜犬人士接受訂製獵犬，以品種狗來進行培育。研究者認為，日

²⁶ 范发迪 (Fa-ti Fan) 著、袁劍譯，《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頁 130。

本在這段所謂文明開化時期，對狗的價值觀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進口的洋犬價值被高舉，而過去常在市鎮村里中自由活動的犬隻飼養方式受到否定，地方本土犬也被看輕。²⁷ 加上1874年（明治7年）起，日本即因狂犬病防治，開始實施犬隻登記、收取犬稅，撲殺在戶外移動的「野犬」——未納入官方登記之犬，市鎮村里中的本土犬（日文稱為「地犬」、「和犬」之「在來犬」）開始面臨生存困境。²⁸ 1895年日本殖民臺灣後，上述有關犬隻的知識、評價與治理方式，隨著帝國進入新的南方殖民地，也對臺灣本土犬隻產生了影響。

三、近代之前及日治初期對臺灣犬隻的紀錄

（一）日治之前對臺灣犬隻的紀錄

在日治之前，關於臺灣本土犬隻已有零星紀錄或地下資料遺存；尤其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間，臺灣畜養犬隻的記載，包括其功能、大小、顏色等，散見於荷蘭時期以來檔案、方志、詩文甚至圖像史料等文獻中，主要多就其協助狩獵或守護警衛作用等功能予以評論，其分類與價值觀，與近代結合獸醫、培育繁殖者所著重的血統、品種及人工培育方式等西方新興狗文化內涵仍有相當的差異，因此本文僅約略觸及晚清之前的歷史，並列舉數個代表性案例，而以日治之後的文獻整理為主。²⁹

依地下考古出土，最早由臺灣人飼養的家犬——所謂臺灣第一犬——骨骼出土於臺南科學園區南關里遺址，擺放方向朝南，與埋葬人體的頭向相同，存在約在四千至五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大坌坑文化時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臺灣本土犬骨骸，這些家犬可能是早期臺灣住民的家庭或社群成員，但關於其外觀的毛色或其功能等，似較不易判明。³⁰

²⁷ 仁科邦男，《犬たちの明治維新：ポ子の誕生》，頁169。

²⁸ 仁科邦男，《犬たちの明治維新：ポ子の誕生》，頁186-208。

²⁹ 1911年日本出版的養犬教科書即是從品種的角度，就功能分類介紹犬隻的特性與外觀，參見杉本正篤，《養犬大鑑》（東京：長隆舍書店，1911），頁25-158。

³⁰ 參考中央研究院南科考古相關成果說明：林婷嫻採訪撰文，〈背後中箭、大啖貝類，史前南科住了誰？〉（2018年1月22日），《研之有物》，下載日期：2022年4月1日，網址：<https://research.sinica.edu.tw/southern-taiwan-science-park-archaeology-li-kuang-ti/>。

臺灣自躍上歷史舞臺後，不斷有外來移民者進入，獵犬亦隨之來到島內，因此本土犬隻也可能經歷混種變化，只是移入的數量有限，遠不及十九世紀末日本統治時期。³¹ 十七世紀中葉荷蘭統治時期，殖民者對臺南一帶獵犬的飼養予以管制，《熱蘭遮城日誌》曾記錄新港社（今臺南新市）居民飼養並繁殖獵犬，另在北部村社（可能是指嘉南平原一帶）也「看到非常多的狗，大部分是長耳朵（steylooren）的和其他不適用的獵狗」，雖然荷蘭人帶了歐洲獵犬來臺，但為治理考量，並不鼓勵在臺灣本地大規模飼養或繁殖，甚至曾想對飼養獵犬進行嚴格限制，常在部落會議中警示原住民不得放養犬隻傷害漢人移民的牛羊。³²

清代統治臺灣，也曾見官方或寓臺文人記錄或評價臺灣犬隻。1717年（康熙56年）及次年，臺灣平埔族原住民兩次到北京面見皇帝，也有獵犬同行。首次進京時，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勘驗貢物後，在滿文奏摺中說，臺灣的狗雖然跑不快，但咬物有力。康熙皇帝批示：「試試看」。次年臺灣平埔族原住民再次上京時，覺羅滿保在貢單上「臺狗肆隻」之下，註記說臺灣的狗「試過能拿鹿」，有狩獵功能，但康熙皇帝認為牠們：「不及京裡好狗。」「知道了。此等物件（指臺狗）皆無用，且前所得者朕培植後已很繁盛，京城各處皆已培植，不必再進。若係朕欲覽之物，再寄來吧。」³³ 對臺灣去的狗似乎不甚看重。不過，有別於皇帝的評價，十八世紀中葉乾隆年間來臺灣擔任鳳山縣教諭的朱仕玠，對於臺灣「番犬」的觀察紀錄則顯示出牠們的珍貴：擅長捕鹿，體型巨大，被剪耳以利其狩獵奔馳，價格非常昂貴。³⁴ 同樣在十八世紀中葉，巡視臺灣監察御史六十七命工繪製「番社采風

³¹ 少部分記載以狗毛編織衣服、毛毯與裝飾物，是荷蘭時期起就存在的觀察紀錄，但目前除臺灣大學藏有夾編獸毛的苧麻編織頭飾外，尚無其他原住民以狗毛為材料的織品。陳光祖，〈綿狗小考〉，《臺灣史研究》（臺北）13:1（2006年6月），頁219-256。

³²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三）1648-1655》（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1654年7月1日、1655年3月11日，引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下載日期：2022年1月31日，網址：<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熱蘭遮城日誌>。1654年7月1日記載，可允許牧師及政務員每人飼養三條獵犬，學校教師每人限制養一隻獵犬，以供應廚房需要，但不可多養。而1655年3月11日記載，為管理獵犬，二林的（Takeys）荷蘭政務員曾建議每戶人家只能養一隻「好的獵狗」，至其他他們認為不合適的狗則要全部殺死。但因養了較多狗的諸羅山社（約在今嘉南平原）的平埔族反對而未能執行。

³³ 蔡承豪，〈臺灣獵狗進京去：從康熙朝覺羅滿保的奏摺談起〉，《故宮文物月刊》（臺北）419（2018年2月），頁17-18。

³⁴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3種，1957；1765年原刊），頁102。

圖」，協助原住民捕鹿的獵犬也在其中具像化，狗的體型被畫得健瘦矯捷，有單色（黑）、虎斑或黑白花色。³⁵ 又過了百年，新竹士紳林占梅於1852年（咸豐2年）詩作中提到，他傍晚在香山道上，看到田園養的黑犬勇猛忠心。³⁶ 這些跨越兩百年的史料，是近代之前部分臺灣的犬隻觀察紀錄。

（二）日治初期有關臺灣犬隻的記載

日本殖民臺灣後，主要因為醫療疾病而開始關注狗的管理問題。總督府檔案中有關犬隻的文書，多數是針對民間畜犬的取締管理規定，大致可歸為公共衛生及財稅兩種目的，亦即前述吳政憲、李若文、龔玉玲三位研究者都曾觸及的狂犬病防制、飼主課稅等規範。³⁷ 但在衛生或行政管理之外，也有對畜犬培育、品種等關心的專家，開始在他們的著作中談到臺灣本土的犬隻。

首先談近代較早開始使用「臺灣犬」之名來稱呼臺灣犬隻的例子。在介紹使用血統觀來談論臺灣的犬隻的文獻前，我們可以先看一件非偏重血統觀描述臺灣本土犬隻的紀錄以作對照。這類的文獻多沿襲傳統以功能而非外觀的角度來觀察犬隻，如1912年於阿美族馬蘭社採集的傳說，阿美族馬蘭社人從火燒島（今綠島）帶回三條狗，經訓練後成為很好的獵犬，受到某些卑南社人覬覦，後來以糯米糰為誘餌將狗偷走。在其中雖然有犬隻的來源地描述，但完全沒有觸及狗的外觀，而是以打獵功能作為故事主要聯結關鍵，與受到西方近代養犬觀影響，著重外觀的血統品種觀念，有相當程度的差別。³⁸ 從部分圖像資料來看，犬隻外觀似亦不太受飼主精準關注。如採集於1914年阿美族太巴塢社、刻畫於柱上的祖先Doci肖像中，有狀似狗的動物圖像，其細長耳、粗尾、四肢、頭部等都是以概略而無特徵方式繪出，而不像圖像中央的人，在臉部、服飾、性徵上等，都有明確細節的

³⁵ 蕭瓊瑞，《島民·風俗·畫：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圖像》（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14年第3版），頁184-187。

³⁶ 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文叢第202種，1964），頁28。

³⁷ 「臺灣畜犬取締規則標準」為其中重要的行政命令，1938年3月廢止。「臺灣畜犬取締規則標準及臺灣畜犬取締規則施行心得標準廢止ノ件（訓令第二七號）」（1938年1月1日），〈昭和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警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401008。

³⁸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調查報告書 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7），頁211-212。

強調。³⁹

1911年東京帝國大學獸醫學背景出身的杉本正篤在日本出版《養犬大鑑》，除介紹有名的野外犬隻及所謂珍貴犬隻外，也探討一般畜養犬。由於當時中上階級重視休閒狩獵，養犬家多關注於獵犬培育，因此畜養犬分類裡獵犬是大宗，包括狩獵犬（獵捕鹿、狐、豬、兔、水獺）與鳥獵犬（獵捕飛禽），此外為使役犬（看家為主，有時兼具獵犬或愛玩犬之功能）及愛玩犬（即今日之寵物）。

杉本氏所談的犬類以近代西方品種犬／純種犬為主（包括被認證為純種犬的日本狍犬），但也及於「日本犬」、「臺灣犬」。「日本犬」尚屬初步的介紹，還沒有發展出嚴格的犬隻標準，品種分類也尚不明，因1920年代日本才興起日本犬保存運動，關注「日本犬」的調查，並於1930年代正式指定多種日本犬作為天然紀念物（詳本文下一節）。而該書特別提及臺灣犬，可能與作者杉本氏於1911年7月來臺擔任總督府農業試驗場技手的經歷有關，使他關注到臺灣犬隻的情形。⁴⁰

杉本氏說使用「臺灣犬」為名，是暫定的名稱（可能意指非正式品種犬）。他認為臺灣犬隻有以下幾種特色：

1. 是看家的使役犬（非列為獵犬）。
2. 可以協助捕捉放養的豬隻，而養豬是臺灣盛行的事（這一點可能也是第一點列為使役犬的原因）。
3. 外觀上，臺灣犬與日本犬沒有太大的差別，但頭型稍狹長、體型較瘦，立耳，尾較長。顏色方面，有許多黑犬，或黑而雜有白。雖也有白、黃、灰色犬，但應不是純種。⁴¹

由以上描述可知，作為一個獸醫、農學教育者背景出身的專家，杉本正篤對

³⁹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調查報告書 第二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9），頁132。

⁴⁰ 杉本正篤，《養犬大鑑》，頁135。杉本正篤在臺超過三十年。他1905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獸醫學實科，1911年來臺前任熊本縣阿蘇農業學校教諭，在臺歷任總督府農事試驗場技手、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教授、高等農林學校教授、農業部技手、技師、中央研究所技師等，1940年退職，轉任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講師、教授、農業試驗所技師等。「教授杉本正篤（中央研究所技師）」（1924年6月1日），〈大正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二卷乙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3852084。並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下載日期：2022年6月29日，網址：<https://who.ith.sinica.edu.tw/>。〔按：為避免繁瑣，以下省略下載日期和網址〕。

⁴¹ 杉本正篤，《養犬大鑑》，頁135-136。

臺灣犬隻的了解，可能主要來自日本在臺農業技術官僚體系對臺灣農家犬隻的觀察，而非山區原住民飼養的獵犬。

而山區原住民所飼養的犬隻，其實除了一般人會提及的狩獵功能外，可能視時機有多種混合作用，包括杉本氏提及的使役功能。由於多是自由放養，在環境中可能受到各種意外，如報紙曾報導南投山區原住民的狗被警察派出所前地雷炸死，「全身粉粹，肉片飛散」，成為殖民者在山區設置新式軍事設施的無辜受害者。⁴²

但必須要說明的，雖然杉本氏到臺灣的早期臺灣犬隻觀察可能並非來自山區，但是至1930年代，他發表有關「臺灣犬壁蝨」研究時，依其說明，他所採樣的「臺灣犬」是來自臺中州塔塔加「蕃地」警察駐在所飼養的狗，亦即到了1930年代，杉本氏已將原住民所在的山區犬隻，也視為是「臺灣犬」。⁴³

另一位同時於1910年代，在著作中記錄臺灣犬隻的，是獵戶轉為育犬家的田丸亭之助。他於1915年出版《畜犬標準書》，⁴⁴ 也以「臺灣犬」之名稱呼臺灣本土的犬隻。兩人都熟悉於近代西方的獵犬飼養知識，但杉本正篤耕耘農學領域，而田丸氏則更能代表日本帝國將犬隻利用於軍事、警備等實務的新趨勢，軍警等功用也是後來日本帝國學知中擴大對犬學研究的重要促因。

田丸氏出身商界，在神戶的鈴木商店工作時，每年秋冬跟隨經營者鈴木兄弟（第二代鈴木岩治郎、鈴木岩藏）在日本內地及蒙古、滿洲、朝鮮、臺灣等帝國周邊狩獵，對獵犬很有研究，初時向東京帝國大學醫科外科教師德人斯克里巴（スクリツパ，Julius Karl Scriba, 1848-1905, 1881-1887年及1889-1901年在日擔任顧問）學習，甚至赴德、英深造，成為繁殖、畜養、訓犬專家，常至海外挑選純種獵犬返日，並開設犬舍，往來者包括日本皇室宮內省御獵犬舍主管。⁴⁵

與杉本氏一樣，田丸氏也受聘來臺、具有臺灣經驗，但他在臺灣的時間可能僅數月。1913年（大正2年）2月起在臺灣總督府擔任囑託，於民政部蕃務本署理

⁴² 〈南投番討伐情報 犬觸地雷〉，《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月26日，第2版。

⁴³ 杉本正篤，〈臺灣產家畜に寄生する壁蝨の一新變種及一新種に就て〉，《熱帶農學會誌》（臺北）8:4（1936年12月），頁340。

⁴⁴ 田丸亭之助，《畜犬標準書》（神戶：田丸獵犬訓練所，1915）。田丸亭之助的著作計有5本：《畜犬標準書》（1915）、《新蓄犬標準書》（1926）、《愛犬讀本》（1929）、《新蓄犬標準書》（1930）、《愛犬讀本》（1931），全部都由田丸獵犬訓練所出版。

⁴⁵ 田丸亭之助，《畜犬標準書》，緒言1-8。

蕃課工作，在臺中縣東勢角支廳牛欄坑隘勇線從事搜索犬調教事務。⁴⁶ 他的訓犬任務主要是配合日軍「討蕃隊」的需要，因應戰的原住民常躲在叢林間伏擊日人，田丸氏須訓練警犬以搜索行蹤不易被發現的原住民。他把握住原住民身上常有的菸草味道，訓練犬隻追逐這特殊的氣味，以達斥候功能。⁴⁷ 他認為培育優良警犬的前提是使用好的犬隻品種，使其具有靈敏的嗅覺、伶俐沉穩並富耐力。考量經濟效益與繁殖力，他選擇以公狐狸梗犬（fox terrier）與母塞特犬（setter dog，屬於槍獵犬）交配，塑造出理想中的警犬。這是德國牧羊犬還沒有被引入日本作為警犬、軍犬的時期。⁴⁸ 在他來到臺灣前，臺灣總督府也已先於1910年（明治43年）向日本內地神奈川縣買了11頭警犬，並於訓練後，次年即投入山區對原住民的戰事中，對於擅長游擊戰的原住民形成威脅。⁴⁹

日本有關於警犬、偵查犬的研究，在1915年時可見於警察系統的山本正一所寫的《警察犬の研究》一書，其著作知識來源為德語出版品，但偏重警察犬之使用方式，而未關注到犬隻品種及畜養等問題，後一部分也是田丸氏著作特別關注之處。⁵⁰

田丸氏認為品種是犬隻優劣的關鍵所在，因此血統書是重要的。養狗要從種犬的選擇談起，之後談繁殖、飼育、疾病治療、訓練。他注意到純種犬繁殖的弊端，認為英國太珍視英倫島國的狗，為了保持其純種，不樂與歐陸犬隻混種，因此代代繁殖後，產生羸弱多病的弊害。⁵¹

⁴⁶ 田丸亭之助，東京築地商業專修學校修業（1890-1893），從商4年，1899年（明治32年）起在神戶鈴木商店工作8年，之後赴英、德學習獵犬練習術，前後達3年。返日後，1911年（明治44年）在兵庫縣開設獵犬調教所。引自田丸亭之助履歷：「囑託田丸亭之助（一時手當金給與）」（1913年2月1日），〈大正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二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2186065。在臺中東勢支廳工作，係引自：田丸亭之助，《畜犬標準書》，頁217。

⁴⁷ 田丸亭之助，《畜犬標準書》，頁218。

⁴⁸ 田丸亭之助，《畜犬標準書》，頁217-219。

⁴⁹ 〈日本の洋犬史・その2 明治の洋犬たち〉，「帝國ノ犬達」，下載日期：2022年3月28日，網址：<https://ameblo.jp/wa500/entry-12251295559.html?frm=theme>；以及同網頁〈台湾の近代畜犬史〉，下載日期：2022年3月28日，網址：<https://ameblo.jp/wa500/entry-11267879265.html>。

⁵⁰ 山本正一，《警察犬の研究》（東京：朝香屋書店，1915）。山本正一（1884-？），日本兵庫縣人，1911年高等文官試驗及格，原於日本本島任職，1915年開始進入警務系統，並於1920年代來到臺灣，曾任臺北州警務部地方警視、淡水郡大溪郡新竹市等地地方理事官，1930-1931年任新竹市尹，之後先後在專賣局和基隆稅關工作，1936年退官。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⁵¹ 田丸亭之助，《畜犬標準書》，頁18-19。

在田丸氏書中，仍非常明顯地高舉西洋純種犬，也認為與洋犬混血、經過改良的「日本犬」（田丸氏稱為「和犬」）可成為優秀犬隻，同時看輕「臺灣犬」等帝國邊陲犬隻。因此著作中談論獵犬、番犬（看門犬）、警犬（護衛犬、搜索犬、水難救助犬）等時，都是以西洋純種犬為主。對「日本犬」的立場是雜交改良，至於臺灣、樺太（今庫頁島）、蒙古等三地犬隻，則被他稱為「未開國的畜犬」（意即野蠻未開地區飼養的犬隻）。

書中所謂「臺灣犬」，就田丸氏而言，僅是一種因地區而生的簡稱，並無嚴格的定義，沒有純種犬的優秀特質，不可能成為培育改良使用的種犬。相異於杉本氏認為臺灣犬與日本犬差距不大，田丸氏認為「臺灣犬」可能是清國犬的一支，而杉本氏認為「臺灣犬」的功能主要是看家及協助捕捉畜養的豬隻，田丸氏卻認為「臺灣犬」較具獵犬功能，可以協助獵鹿——由此可知田丸氏看到的「臺灣犬」是以山區原住民的狗為主。⁵² 他說臺灣原住民非常重視狗，甚至可以用妻子交換。但他認為傳統畜犬方式不佳，沒有為犬隻設立固定的狗屋，除了打獵的日子外，平時不會給予食物，任其自由行動，放養在小屋旁，甚至吃人們的排泄物，夜間也讓牠們伏在小屋旁睡覺，執行守衛看門的任務。只有到打獵之前，狗才可以得到主人豐富賞賜的食物，精力旺盛地與主人一起到山裡工作。相較之下，田丸氏對於樺太犬及蒙古犬的飼養方式及品種，則給予較高的評價。⁵³ 需要注意的是，如前言提及的前人研究，美國人類學家Simon運用人狗相互馴化及多物種民族誌的概念分析臺灣原住民賽德克族與犬隻的關係，可知原住民飼養犬隻自有其文化脈絡，包括是否應限制犬隻在外活動，獵犬的餵食時機，訓犬的方式與時間等，與殖民者受西方影響的近代飼養犬隻觀念不同，因此自認居於優越地位的殖民者所記載或批評的，實未完全公允，也缺乏臺灣本土文化背景思考。

諷刺的是，這些田丸氏評價不高的臺灣犬隻，卻是日軍征討山區時的勁敵。1910年代在臺灣報端，偶然可見臺灣地區的「蕃犬」（當時媒體對臺灣本地犬隻的稱呼）身影，其形象卻是聰明、勇猛、刁鑽，成為日軍在戰地備覺困擾的對手。一位詩人望蜀山人即曾在1918年（大正7年）作詩道：「元氣旺盛橫斷隊，蕃犬躍

⁵² 田丸亭之助，《畜犬標準書》，頁231-232。

⁵³ 田丸亭之助，《畜犬標準書》，頁231-235。

出咬技師。著花蓮港直入院，敢可非心配程疵。」記錄了臺灣山區犬隻咬傷日本技師的事件。⁵⁴

綜合言之，從1910年代出版品可知，在西方新興的犬隻評價標準下，農學獸醫專家杉本正篤已初步勾勒出臺灣犬隻的外型特徵，並從較正面的角度說明臺灣犬隻與人們生活之間的互利關係，他所列舉對外型特徵的看法，也建立了後來「臺灣犬」標準的基礎。而犬隻培育者田丸亨之助則觀察到山地臺灣犬隻作為獵犬的情形，雖不認為牠們是優秀品種犬，但是牠與飼主之間緊密的關係，也是後來常被提及的部分。

在兩位專家看法明顯歧異的部分，來源上，杉本氏認為臺灣犬隻與「日本犬」大致類似，而田丸氏則認為「臺灣犬」為中國犬隻的一個支系。田丸氏批評臺灣犬隻的飼養方式不佳，食物及居處都不當，與美國人類學家Simon從文化深層內裡來進行解釋，強調臺灣原住民族尊重犬隻的自主能動性，是完全不同的觀點。

無論如何，杉本氏及田村氏開啟了近代獸醫與犬育家從西方新興狗文化立場談臺灣犬隻的特質。這些專家之言，難以視為是一種新觀念的轉譯，在當時也絕無在地化的傾向。而對臺灣犬隻更多的調查與認識，則尚有待下一階段，在國族意識發展、戰爭時局背景及軍方獸醫等脈絡下推動。

四、日治中期對臺灣犬隻的初步調查與紀錄

臺灣犬隻在 1930 年代的新一波調查，深受日本帝國的治理所影響。美國歷史研究者 Skabelund 曾以「犬的帝國」為題，探討日本帝國時期對於其本土及殖民地犬隻的政策，包括所謂文明化措施（特別是因應狂犬病而產生的撲殺取締及畜養稅等管理）、帝國忠犬與日本犬的形塑、戰爭時期動員及寵物商品化等。⁵⁵ Skabelund 說，1930 年代日本犬成為國家足資誇口的象徵，但這在 1920 年代初期，卻還是完全無法想像的事。⁵⁶ 可知 1930 年代是日本將犬類國族化，以純種

⁵⁴ 〈蕃犬〉，《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10 月 21 日，第 5 版。

⁵⁵ Aaron Herald Skabelund, *Empire of Dogs: Canines, Jap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mperial World*.

⁵⁶ Aaron Herald Skabelund, *Empire of Dogs: Canines, Jap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mperial World*, p. 95.

概念看待其帝國內本土犬的關鍵時期。這個時期也是日本軍國主義開始對外擴張的年代，軍用犬的需求使狗的培育與訓練成為國家要事。在指定紀州犬為日本天然紀念物時，即有專家特別強調此種少與洋犬混和的「國粹犬」，未來可望成為活躍戰地的軍用犬。⁵⁷

日本犬保存運動形塑了日本人觀念中理想型的國家犬，正式始自1928年（昭和3年）日本犬保存會的設立，也催生了與洋犬對等的日本犬標準，當成日本傳統的「在來犬」，並在1930年代正式納入國家的天然紀念物中。從標準確立的確切時間而言，1934年（昭和9年）日本犬保存會制定其犬隻標準，分別依大型、中型、小型區分，選出六種犬類：秋田犬、甲斐犬、紀州犬、柴犬、四國犬、北海道犬，各日本犬被指定為天然紀念物的時間為1930年代1931-1937年間。⁵⁸ 後來日本犬專家以後見之明回顧日本犬形成的歷史，認為1921年（大正10年）至昭和初期（約1926年後）與洋犬的混種風潮，這段時間成為日本犬血統的「崩潰時代」。⁵⁹ 當時洋犬的運用範圍非常廣泛，如上節所述，育犬專家也認為日本犬需進行改良，要透過與洋犬或日本本土其他犬類混種繁殖，才能形塑出繁殖者認為優秀的品種。

在日本帝國開始確定其「在來犬」標準，調查並頒布列入天然紀念物的動植物名稱時，臺灣的本土犬隻也逐漸受到關注，更多調查始於1930年代史蹟天然名勝紀念物調查事業時期，這個階段留下更多的照片圖像，也成為戰後探索「臺灣犬」標準的重要參考。由於此時已臨近戰爭時期，因此調查過程中常以可否培育訓練為優秀軍用犬為目標，軍方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獸醫師的意見尤具有關鍵影響力。然而臺灣犬種的認證標準尚未確立，各方對於其外形與發展潛能有多元的評價。不過大致而言，臺灣犬隻與原住民生活有著極為親近的關係，卻是相當一致的看法。

以下列舉實例，說明當時以日籍為主的愛犬人士的看法及民間或軍方的調查結果，目的在說明他們雖常同受西方品種觀的影響，但也有不同的評價產生。筆

⁵⁷ 大阪每日新聞社學藝部、東京日日新聞社學藝部編，《天然紀念物を探る》（大阪：株式會社盛文館，1936），頁195-197。

⁵⁸ 各種犬指定年份參考「公益社団法人日本犬保存会」，下載日期：2020年8月16日，網址：<https://www.nihonken-hozonkai.or.jp/>。〔按：為避免繁瑣，以下省略下載日期和網址〕。

⁵⁹ 愛犬の友編集部編，《改訂秋田犬読本》，頁265；「公益社団法人日本犬保存会」。

者行文中的「生蕃犬」、「蕃犬」、「泰雅犬」、「布農犬」、「高砂犬」都視為是「臺灣犬」或其分支類別，由於 1930 年代曾有畜產行政人員明指「臺灣犬」及「蕃犬」是不同類別的臺灣在來犬，其說與 1910 年代田丸氏、1920 年代獸醫宮本生（實際名字不詳）的看法及戰後看法有別，雖不排除這個時期將原住民飼養的犬隻從「臺灣犬」中別立分支的可能，但因為目前掌握到此說的資料幾乎絕無

僅有，本文仍暫以大方向（納入，而非排除在外）來說明，來日若有更多資料出土再予補充修正。⁶⁰



圖二 宮本生談論「蕃人」與狗的插圖

資料來源：宮本生，〈蕃人と犬 第一は狩獵の目的 第二は糞便の掃除役〉，《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25 日，第 4 版。

在分析日人的相關評價報導中，出現了部分珍貴手繪或照片的圖像資料，不但有助後人了解當時飼主對待本土犬的方式，也令人可想像並重現犬隻的外觀，從中足堪略窺人犬關係，這種關係有其傳統色彩，也具有近代新的因素。如 1922 年宮本生對原住民（如泰雅族）與狗的關係撰寫專文，附圖（圖二）可見原住民獵人以牽繩帶著像幼犬的獵犬，犬隻神采奕奕，飼主身上揹負番刀、藤編簍籠，手提現代獵槍。狗的外觀略近於今日臺灣犬命名後的規格，但有一耳非立耳。在傳統以放養為主的原民社會，牽繩卻在狩獵時使用，可能有其特殊的用意。一種推測是原住民在訓練幼犬時，為

讓獵犬克服天生對鞭炮、槍聲的畏懼，免於聽

⁶⁰ 蹄枕，〈畜犬の改良機運熟す〉，《臺灣之畜產》（臺北）5: 4（1937 年 4 月），頁 14。〔按：蹄枕另有筆名福井蹄枕，或蹄枕生，原名福井淺一。〕1920 年代宮本生對原住民族（歷史名詞「蕃人」）的狗使用「臺灣犬」稱呼。宮本生，〈蕃人と犬 第一は狩獵の目的 第二は糞便の掃除役〉，《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25 日，第 4 版。宮本生這篇文章分別於同年同月 25 日及 26 日刊出，但沒有分上下。1990 年代畜犬界人士陳明南將「臺灣犬」區別為泰雅犬、布農犬及平地犬三種。林星輝，《臺灣國寶犬》，頁 100-106。

到槍聲立即遁逃，而將其綁在主人腳邊使其無法逃走，等訓練過的獵犬習慣爆發性的聲音後，方能在主人槍擊獵物時立即上前追去。宮本生亦提及獵犬的訓練自幼開始，並在狩獵中實地行之，狗還不太能獨自行走即抱著同去狩獵，使其嗅聞血腥而習於追逐獵物。⁶¹ 以下再略從正負兩面，看日人如何就利用角度，以血統品種觀為核心，評價臺灣本土犬的幾份資料。

（一）對臺灣本土犬隻的正面評價

首先談肯定派、支持派的說法，大致有從保育與軍用兩方面理由考量。建議將臺灣的犬隻納入天然紀念物指定者，某種程度可歸屬保育原因。1934年狗年時，臺灣報刊在新年期間刊出了一些與臺灣本土原種犬相關的報導，包括提供照片的具體圖像。號稱愛犬家的《臺灣日日新報》編輯長、實業家木村泰治，向記者展示了自己飼養的臺灣「生蕃犬」（如圖三），予以高評價，主張應將「生蕃犬」納為臺灣的天然紀念物。他說這種狗由阿里山、太平山的原住民飼養；⁶² 分為大中小三種，特色為立耳、尾巴有差尾（直狀尾）及卷尾兩種，氣質精悍、勇猛，對主人極為忠實，不食用外人給的食物。「蕃人」狩獵用，絕不離身，非常珍貴，相當於一頭牛的價格，宜指定為天然紀念物加以保護。⁶³ 新聞報導中的「生蕃犬」照片是深色犬，足部有白襪色，身體略寬壯，耳朵較厚實，腿略短，狗毛似蓬鬆，一字形尾。其形象與2015年經認證的臺灣犬形象—細尖耳、杏仁眼、三角型狀頭部和鐮刀狀尾巴—似乎部分有所差異；特別是他認為臺灣犬的大小有三種，尾巴有卷尾或直尾兩種，與2015年所認定的「臺灣犬」單一標準顯然不同。次年（1935，昭和10年）木村氏在另一文中說，隨著日本內地流行日本犬，近年日人也到臺灣調查本土犬隻，但對城鎮如霧社所買的狗未有好評價。木村氏認為，好的「生蕃犬」只存在山林偏遠處，未被洋犬混種，是原住民狩獵良伴，也能看

⁶¹ 有關以牽繩帶著幼犬是一種原住民狩獵的訓練方式，此一推測是審查人多次觀察與訪問原住民訓練獵犬所得，非常感謝不吝提供。本條文獻資料則出自宮本生，〈蕃人と犬 第一は狩獵の目的 第二は糞便の掃除役〉，《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月25日，第4版。

⁶² 推估其說法係指鄒族及泰雅族。

⁶³ 〈いま流行の 原種犬の話 臺灣の生蕃犬も 立派な天然記念物〉，《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月1日，第13版。



圖三 實業家木村泰治的「生蕃犬」

資料來源：〈いま流行の 原種犬の話 臺灣の生蕃犬も 立派な天然記念物〉，《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月1日，第13版。

家。他強調，軍用犬多來自寒冷地區的德國牧羊犬，在炎熱的臺灣能力受限，這也是他看重臺灣本地犬隻的原因（此說在 1936 年軍方訓練臺灣本土犬隻試驗失敗後即不再受重視）。⁶⁴

1935 年有另一篇傾向軍用正面評價的報導。當時具有軍方背景的人士曾派遣獸醫在花蓮一帶部落中作臺灣本土犬隻的調查，並比較了「泰雅犬」、「布農犬」不同的特性，認為臺灣本土犬隻有成為軍用犬的潛力。據報導，前臺灣軍司令松井石根（1933 年 8 月-1934 年 8 月在任）計畫利用布農族與泰雅族飼養的高山犬隻作為軍用犬，而派人在花蓮港廳作過多次的純種犬調查，但一直無所獲。及至 1935 年，警務課理蕃係中，號稱花蓮港廳廳下唯一蕃犬通的本田獸醫⁶⁵ 發現一頭極優良、純種的「布農犬」（如圖四），觀察其特性後，他深信「蕃犬」可以成功作為軍用犬。依其看法，花蓮港廳的「泰雅犬」身軀較大，接近牧羊犬，而「布農犬」相形之下較小，腳上有枯葉色或漆黑色的短毛，但多非單一顏色。他說，在臺灣東部沿海支廳中「布農犬」非常稀有，500 頭中才找得到 1 頭。而能力測驗中，「布農犬」對於蕃地的守衛及潛伏有優秀的表現，但「泰雅犬」在原野或長

⁶⁴ 木村泰治，〈生蕃犬〉，《臺灣婦人界》（臺北）2:2（1935 年 1 月），頁 63。

⁶⁵ 可能為本田文武，他在臺北州內務部勸業課任防疫獸醫（1940）、殖產業農業課及獸疫血清製造所任技手（1941）、花蓮港廳勸業課技手（1942-1944）、花蓮港廳廳立花蓮港農林學校技手（1944）。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圖四 1935年日本軍方在花蓮港廳發現純種「布農犬」

資料來源：〈純粹のブノン犬を本田獸醫が發見 毛色、特徴その他性能等を『……詳しく語る……』〉，《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3月6日，第3版。

距離的運動中表現較佳，亦即有較好的體力。外形上，「布農犬」為立耳，筒形管狀（即虎耳）者多，聽覺非常靈敏，頭大，臉短，眼睛小，胸部發育佳，四肢健壯，腳力可耐長距離的活動。尾巴上捲，而臺灣原住民認為尾巴向左捲者最擅長獵山豬。但本田獸醫也同時批評原住民畜養犬隻方式不當，是以廚餘餵養，大半使用芋藟的皮，他認為是一種虐待；因食物不足，平時牠們會自己到田裡挖掘黍芋等食用。不過出獵前，牠們可以得到肉食。幼犬約三個月大就開始與親犬一起出獵學習狩獵，非常伶俐。成犬後，可以記憶二十里的路程，會自己回家。本田獸醫深信「布農犬」具有成為好的軍用犬的潛力。雖然沒有經過訓練，也會知道狩獵時要潛伏。可惜與日本犬或洋犬相比，「布農犬」比較不親人，兩、三個月大之後就不容易馴服。⁶⁶遺憾的是除這份報導外，尚未見到其他有關「布農犬」的調查史料。至於與「布農犬」相提並論的「泰雅犬」，動物學家大島正滿雖是魚類而非犬學專家，但也曾就一次泰雅族出獵的實地觀察經驗，給予「泰雅犬」勇猛的評價。他於1935年出版的泰雅族相關著作中，雖未針對犬隻的外觀、大小等記載，然而字裡行間描述了「泰雅犬」的剽悍，甚至曾緊咬郵差的咽喉致死，使靠近蕃社的外人心生畏懼，泰雅族人出獵時，必有猛犬陪同。⁶⁷

⁶⁶ 〈純粹のブノン犬を本田獸醫が發見 毛色、特徴その他性能等を『……詳しく語る……』〉，《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3月6日，第3版。

⁶⁷ 大島正滿，《タイヤルは招く》（東京：第一書房，1935），頁105-109。

（二）對臺灣本土犬隻的負面評價

但另一方面，也有獸醫對臺灣本土犬隻提出低評價的不同觀點。如 1934 年元旦，《臺灣日日新報》一篇報導依據獸醫之說，對臺灣本地犬持保留的評價：「生蕃犬」是臺灣的在來犬，一般人想像中牠是狼與山犬的混種，具有優良體格等等，然而事實卻可能並非如此。依稻葉獸醫⁶⁸之語，臺灣本土犬隻長期處於營養不良的狀態。但原住民對狗非常寵愛，將獵犬視為家庭成員，犬隻死亡時，主人極其傷悲；犬隻數也計入家中戶口，每戶養五、六頭（但屏東平均一戶僅飼養兩頭），甚至比兒子還疼愛，早晚不離身；在部落中，也可以擁有犬隻的多寡，來判斷各家庭貧富的狀況。⁶⁹ 以上獸醫對臺灣本土犬的看法，關於畜養方式及狗是家庭成員，某種程度重覆了前述田丸亨之助在著作中的說法。1930 年代瀨川孝吉進入中央山脈等深山部落調查記錄臺灣原住民生活，所留下的照片也可佐證，如 1936 年 12 月 31 日布農族人 Lahuan 招待瀨川氏的歡迎酒宴中，數隻家犬穿梭或站立在人群中，甚至也食用放在地上容器裡的酒糟。⁷⁰

另一說法則可能也是獵奇式地描寫「蕃犬」飼養方式，亦即由狗來清除家中小兒糞便（日語稱為便所掃除役）。⁷¹ 事實上在 1920 年代介紹原住民與犬隻的文章中，即有同樣的說法，認為狩獵及協助維持清潔是兩大養犬功用。⁷²

1936 年臺灣軍獸醫部訓練臺灣本土犬隻的經驗，也是負面的結果，這可能是日治時期唯一一次軍方實地試行訓練臺灣本土犬隻的紀錄，或許也因此否決了使用臺灣本土犬隻作為軍用犬的構想。訓練的是來自南部的臺灣本土犬隻，總體評價認為牠們除對單一主人外，不易聽命服從，且體力不佳。軍部的報告指出：自

⁶⁸ 可能指稻葉吉，1934 年時在臺中州警務部衛生課擔任技手。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⁶⁹ 〈生蕃犬は 臺灣の在來犬 犬を我兒よりも 可愛がる蕃人〉，《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1 月 3 日，第 4 版。

⁷⁰ 湯淺浩史，《瀨川孝吉 臺灣原住民族影像誌 布農族篇》（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9），頁 211-213、216。一張攝於 1920 年代排灣族 Kulalao 社一家團圍繞用餐的照片，也可見到狗立於一旁。陳宗仁主編，《世紀容顏（下）：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日常生活、服飾、家族人物》（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頁 66。

⁷¹ 〈Y 談がたつて 舌を切られた／蕃犬の話〉，《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1 月 4 日，第 9 版。

⁷² 宮本生，〈蕃人と犬 第一は狩獵の目的 第二は糞便の掃除役〉，《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25 日，第 4 版。

古以來臺灣各族習於養狗為獵犬，但隨著交通頻繁，臺灣犬隻與外來犬隻混種，只能在深山蕃社中找到純種犬。「蕃犬」對主人絕對服從，可在山野中長途跋涉，特別擅長在坡地上下。毛色以黑色及褐色之單毛色為主，下腹部及四肢下端混有白色。為軍事利用，軍方接受高雄州屏東郡ライブアン社（與臺東廳交界，約為今日大武，以魯凱族為主）獻納的公母各兩頭犬，於1936年12月3日在臺灣山砲兵聯隊繫養。由於之前「蕃人」常餵以薯，犬飼料缺少營養價值，犬隻抵達部隊時雖已五個月大，但發育不良，在軍中漸改為普通飼料，並為因應環境變化、防治犬疾病，特別是犬瘟熱，而進行預防接種，也作了幾次驅蟲。之後對犬隻實施正規訓練，結果執行不十分確實，雖可供傳令，但不親人，不完全聽命於士兵。而且犬隻體型較小，體力不太好。剛到部隊時瘦骨嶙峋，平均身高31.05 糎（相當於公分）、平均體重4.25 鈞（相當於公斤），一個月後大幅長高又長胖，平均身高43.00 糎，平均體重為13.36 鈞，也還不是大型犬。（圖五）⁷³



圖五 在臺灣山砲兵聯隊軍犬舍裡接受訓練的公犬栗（くりちゃん）

資料來源：〈台灣犬界と戦争〉，「帝國ノ犬達」，下載日期：2022年3月28日，網址：<https://ameblo.jp/wa500/entry-11267879265.html>。

⁷³ 參見〈台灣犬界と戦争〉，「帝國ノ犬達」，下載日期：2022年3月28日，網址：<https://ameblo.jp/wa500/entry-11267879265.html>。該網頁使用典藏於日本的史料，惜未註明原資料出處。

其後日本軍方確立引進外來品種犬培育臺灣需用的軍用犬，這種考量風土馴化的問題，就像當初日人在臺推動馬政計畫時，曾討論是否要作出耐熱軍馬一樣，⁷⁴ 戰爭時期熱地軍用犬尤成為新的問題，甚至 1943 年成立熱地軍用犬普及委員會推動。⁷⁵ 惟此部分與臺灣本地犬隻關係較少，本文暫略。

1937 年（昭和 12 年）時，六種日本犬均已完成天然紀念物的指定，或許受到此一結果鼓勵，在臺灣正籌設國立公園的背景中，於此地開業的獸醫師、軍犬會成員宮本佐市⁷⁶ 在 1939 年（昭和 14 年），也針對臺灣本土犬隻（「生蕃犬」、「高砂犬」）的原種保存，⁷⁷ 從避免其滅絕的角度，在報端主動撰文，建議應在籌設中的國立公園裡，保護臺灣本土犬隻。他是軍犬界重要獸醫（也是上述熱地軍用犬普及委員會幹事之一），左右軍用犬的評審工作，也常為臺灣的軍用犬活動作報導。宮本認為：「高砂犬」或許不如日本犬而有各種缺點，但也是高砂（臺灣）本土象徵。長年以來「高砂犬」與臺灣高砂族（指原住民族）關係密切，既是良伴般的家犬，也是忠僕般的助手，可以說是「高砂族之魂」。但因與洋犬混種雜交的結果，當時只留下約兩、三百頭純種犬；如果再放任下去，幾年之內將找不到「高砂犬」。他還寫到，自己在臺灣山林中，看到黑白斑紋、垂耳的雜種犬時，內心十分地失望，體會到往往因為人們的忽略，而造成自然之美的消失。國立公園成立的目的是保護、保存山川草木禽獸，因此也應保護及保存生活其上的本土犬隻。宮本獸醫還具體描述了「高砂犬」的標準：立耳、直滑毛，體型較小，重約 2-5 貫（每貫約 3.75 公斤，因此體重約在 7.5-18.75 公斤）。尾巴可為卷尾或差尾，毛色為黑色、紅褐色、茶色混黑色，白色較少，各種單一顏色外，常在腳趾、尾巴尾端、胸前有白斑。（如圖六）

⁷⁴ 關於臺灣（及南方）的軍馬是否應特別注意其耐熱能力的問題，林欽傑認為在 1908-1936 年間討論最為熱烈，並且作出了無需特別顧慮，但著重管理照護使馬匹自然馴化的結論。參見林欽傑，〈馬與人交會的臺灣史：以輸入馬的風土馴化與利用層面為中心（1630-1945）〉，頁 73-94。

⁷⁵ 〈暑熱にひるまぬ 軍用犬を育成す 創立總會開き愈よ發足 熱地軍用犬普及委員會〉，《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3 月 27 日，第 3 版。

⁷⁶ 宮本佐市是在臺北開業的獸醫，1927-1929 年在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部畜產科擔任「雇」（即雇員），1930-1935 年轉至臺北醫學專門學校，1936 年在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職務都是「雇」。戰爭時期為大日本軍犬會臺灣支部役員，在軍犬展覽會中常負有審查重責，也屢在日本發行的《軍用犬》期刊撰文談臺灣的狗。其履歷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⁷⁷ 1935 年國勢調查中將「生蕃」更名為「高砂族」，原「生蕃犬」之名也相應改稱「高砂犬」，但至 1945 年日治結束前，兩個名稱經常會混同交互使用。

但比較宮本獸醫所提供的「高砂犬」圖像，與另一張日治時期 1920 年代間頗負盛名的賽夏族人出獵圖（圖七）⁷⁸——後者幾乎是命名完成的「臺灣犬」標準產生的模式標本——二者實有相當的差異，特別是在頭部的部分，「高砂犬」偏圓而不似三角型；尾巴較粗，嘴亦不尖；毛似乎較長。因此可以說，日治中後期在臺灣重要的犬族專家宮本獸醫所判定的「高砂犬」，與賽夏族出獵圖裡的「臺灣犬」有相當多的差異。賽夏族人出獵照片是上世紀末臺灣犬界繁殖復育「臺灣犬」時，奉為「臺灣犬」外型上的正宗指南，育犬者最常引用、比對作為繁殖培育的依據。



圖六 1939 年宮本佐市獸醫主張保護國立公園的「高砂犬」

資料來源：

〈國立公園と高砂犬 生蕃犬を保護せよ〉，《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8 月 16 日，第 3 版。

戰後日本專家來臺灣作臺灣本土犬隻調查時，曾回顧 1930 年代的調查，也認為當時各觀察記錄者的標準判定不明。有人認為「布農犬」多為中型、豎耳、刀尾，毛色以純黑、白黑斑、黑褐色居多；又有人認為花蓮港廳下所飼養的狗以「泰雅犬」與「布農犬」為主，「泰雅犬」體型較大，近似德國牧羊犬，毛色多為黃褐色、白色、焦紅、虎毛等，罕見黑色；「布農犬」則較小型，腿短且毛密，黃褐色、墨黑者居多，虎斑者罕見。另一派綜合各家報告者則認為，「生蕃犬」屬中型犬，豎耳，毛稍短，多黑色毛，也有不少黑底白斑，但毛色似乎視地域而有所差異。⁷⁹

綜合言之，日治時期對於臺灣本土犬隻的標準實未定著，觀察記錄者有不同的量尺來予其定義。而 1930 年代臺灣本土犬隻受到關注，主要是尋找臺灣本地

⁷⁸ 林星輝，《臺灣國寶犬》，頁 25。此張照片攝於賽夏族大隘社，約為今天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1920 年代在日本印製，由臺北勝山寫真館發行。陳宗仁主編，《世紀容顏（上）：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頭目、勇士及傳統工藝》（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頁 96。

⁷⁹ 太田克明等，〈台湾ならびに韓国在来犬の外部形態調査結果〉，《在来家畜研究会報告》（愛知）13（1990 年），頁 27-50，轉引自摘譯報告，林星輝，〈臺灣家犬飼養的歷史與現狀〉，收於林星輝，《臺灣國寶犬》，頁 119-120。



圖七 1920年代出現的賽夏族出獵圖

資料來源：陳宗仁主編，《世紀容顏(上)：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頭目、勇士及傳統工藝》，頁96。

是否有合適培育訓練為軍用犬的狗，因此其評價標準，常出自軍事、警備等功能，注重其是否陽剛、能否順從指揮、有無良好體力、能否適應特殊地形等戰地需求，而非看重牠們的歷史背景、社會文化生活或與環境的關係。再者，或許受到日本犬保存運動背景的影響，幾位調查者採保育理由，認為純種臺灣本土犬隻面臨洋犬混種而有雜種化的危機，因此應該加以保護保存。而當時卻罕有人探討「日本犬」與「臺灣犬」在血源上有無遺傳關係，與戰後調查者思考的立場並不相同。

無論如何，進入戰雲密布時期，臺灣本土犬隻的相關報導幾見消失，關注焦點完全是以洋犬為基礎的軍用犬。例如1937年起，每年代表臺灣到日本內地參加帝國犬競賽的犬隻，通常是德國牧羊犬、杜賓犬等洋犬。⁸⁰ 出現在刊物上的戰地

⁸⁰ 〈臺灣代表犬 二頭決定 きのふ審査會〉，《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3月22日，第7版；〈優勝犬競技大會の臺灣代表犬を選ぶ 廿四日臺北で競技會を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4月5日，夕刊第2版；〈全臺灣代表犬 高砂丸で内地へ〉，《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4月12日，夕刊第2版。

軍犬班照片也多是洋犬身影；戰時講述臺灣出產狗的故事，也以歐美種系犬隻為主，如1938年（昭和13年）獸醫宮本佐市的「臺灣軍犬美談」，主角傳令犬ゴール號，是一頭萬能狹（Airedale Terrier）公犬。⁸¹ 可以說，就報紙期刊及各種存留的文獻看來，臺灣本土犬隻的身影在戰爭時期逐漸消失在大眾眼前；即使是在臺灣繁殖的洋犬，也多被看成比在日本或歐美所產的洋犬略遜一籌，需仰賴日本內地移入優秀軍犬改善。

五、戰後對臺灣本土犬隻的調查及完成命名

重洋犬而不重本土犬的風潮，延續到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在「中國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新聞片「憲兵軍犬訓練」中，可見到當時軍警憲所用的犬隻百分之百仍為戰爭時期所重用的德國狼犬。⁸² 臺灣本土犬隻普遍未受社會關愛而地位低下，地方行政機關將街上流浪犬捕捉送去臺北的動物園「餵大野獸」，以「減輕動物園的負擔，又可來個滅屍乾淨」，而記者則評論此一措施「令鐵柵欄外旬日不知肉味的公務員遊客見之，不勝艷羨」。⁸³

1950年代後臺灣社會逐步安定，喜好洋犬的「愛犬家」興起，以狗來彰顯其特殊身分與品味。他們吸收日人育犬出版品知識，並於1950年代中期起在各縣市成立畜犬協會，以德國狼犬為主作純種犬的繁殖、訓練及買賣，建立純種犬標準，發行血統證明書。至1960年代，臺灣社會流行小動物繁殖販售以作為家庭副業，所謂純種名犬成為寵物商品。⁸⁴ 這些發展都以洋犬為主，⁸⁵ 純種犬的命名也以反映異國風為榮，如德國狼犬多用德文名字，日本狍犬用桃太郎、秋子等日式名，英國指示獵犬（English Pointer）以英文名為主，北京犬則稱為張三、李四、王好、

⁸¹ 宮本佐市，〈臺灣軍犬美談 傳令犬ゴール號〉，《軍用犬》（東京）7：7（1938年），頁85-87。

⁸² 〈人類的忠實伙伴：獵犬、軍犬、臺灣犬概述 憲兵軍犬訓練〉，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典藏臺灣」，下載日期：2022年1月3日，網址：<https://digitalarchives.tw/Exhibition/2705/1.html>。

⁸³ 〈獅·豹·熊·狼 一群野獸飽餐 將捕捉市內野狗 送去動物園加菜〉，《中央日報》，1949年5月14日，第3版。

⁸⁴ 龔玉玲，〈狂犬、名犬、流浪犬：臺灣現代社會如何面對狗的生物性〉，頁54-57；簡好儒，〈寵物商品化與價值變遷：分析1950年代後犬市場的形成與變遷〉，頁44-63。

⁸⁵ 翻開1960年代有關臺灣犬界的出版品，不論是照片、飼養歷史或養殖技術、比賽審查等訊息，所見大半與德國狼犬相關。如陳克裕，〈臺灣犬界〉（臺南：中華出版社，1966）。

劉寶等。⁸⁶

(一) 1960年代至1980年間的日本在來犬調查與臺灣本土犬隻

臺灣本土犬隻開始受到臺灣社會的正視，與日本學界來臺執行家畜調查有密切的關係。日本的「在來家畜研究會」於1961年成立，基於區域間生物遺傳因子有交流關係，半世紀以來持續在亞洲各地廣泛作原生種家畜的調查。日本犬渡來說在戰後談論日本犬的書籍裡其實並不罕見，涉及的國家及地區非常廣泛。如1960年代出版的犬學著作中，渡瀨庄三郎博士認為，日本犬可分為三個系統：(1)最北系的大型犬是來自歐亞大陸北方，經過中國，移至泛西伯利亞，由該區域民族飼養的狗，再從北方傳入日本，秋田犬為其中一種。(2)中北系的中型犬是繼泛西伯亞民族發展的新西伯利亞民族的狗，經朝鮮傳入日本，主要為本州以外日本海沿岸地區出產的狗。(3)南方系小型犬從南洋而來，常見於九州、四國及本州中部以南。⁸⁷ 日本「在來家畜研究會」自成立後，長年大範圍對外調查家畜根源，1960年代從日本南方九州鹿兒島、琉球開始，再往臺灣、韓國、小笠原群島、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斯里蘭卡、孟加拉、尼泊爾、中國、越南、蒙古、寮國、緬甸、柬埔寨、不丹、哈薩克斯坦等，至今仍持續進行中。這些對外調查除日本學者參與外，均需取得當地學界及官方的合作才能順利執行。

臺灣部分曾有兩次較長時段集中調查：首先是1966-1967年間來臺做在來家畜調查，前後共三次，對象為臺灣的原生種牛、豬、山羊、雞，1969年刊行調查報告。其次則是在來犬，於1978-1980年間從事東亞田野調查，1980年發表日本的在來犬調查報告，十年後再發表臺灣、韓國的在來犬報告。⁸⁸ 臺灣的調查在20個山區部落中進行（臺灣畜犬協會官方資料誤植為29個部落），1980年7月26日至8月29日實地上山採檢血清等，來臺的日本團隊成員包括名古屋大學太田克明教授以及岐阜大學碩一學生水谷正俊、森幹雄共3人，1990年發表的調查報告上掛名者除這三位外，加上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宋永義（掛名第四）、田名部雄一、安田高

⁸⁶ 陳克裕，《臺灣犬界》，頁153。

⁸⁷ 愛犬の友編集部編，《日本犬中小型読本》，頁4-5。

⁸⁸ 日本「在來家畜研究會」，下載日期：2022年1月20日，網址：http://zairai.org/Zairai_report.html。

彌、武藤範幸、宮川博充、武藤靖子、工藤忠明、柳在根共11人。⁸⁹

2020年宋永義接受訪談時說明，日本人在亞洲從事家畜調查係為了尋根，探索「日本犬」的可能來源，並推測犬隻移入日本是黑潮文化使然，亦即南方（包括臺灣）的犬隻乘著木頭，透過海水漂流到北方。⁹⁰ 這種看法為「日本犬」與「臺灣犬」找到直接聯結的可能，甚至暗示部分「日本犬」源自「臺灣犬」，與1930年代日本統治時期強調的內地犬、洋犬優越論已大不相同。戰後這次臺灣在來犬調查方式是在山地部落集合家犬，依血清檢測、電氣游動法分析其遺傳因子，結果發現「日本犬」和「臺灣犬」有相當程度的血緣關係，尤其是日本柴犬。⁹¹

雖然1930年代對臺灣犬隻的調查標準不定，但1966-1980年日人的家畜尋根之旅仍是立基於過去專家們的紀錄，加上新的血清檢測分析了解其生物遺傳因子，找出臺灣犬隻的特徵，並對受測犬作血統純度分級，以明白臺灣犬隻當時現況。亦即新舊結合，採用新的生物學技術，也與過去的分類判別觀點有所連續，而有新的發現。

（二）「臺灣犬」的命名歷程

1990年代正式啟動的「臺灣犬」命名歷程可能由幾個因素促成：首先是社會政治背景。臺灣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邁入社會轉型期，政治朝向更多元的開放，而1990年代民主化、臺灣化、多元文化主義中，在公私領域都開始採用更多臺灣本土素材作為國家的象徵。⁹² 社會經濟的背景—亦即商業炒作，自然也不可忽視，參見以下育犬組織部分的說明。其中商業經濟性動機是極重要的一部分，以《光華畫報》報導為例，在1980年8月時曾以〈狗來富〉為題，報導臺灣犬界對狗的品

⁸⁹ 以上訪查日期及人員，係參考宋永義提供的「臺灣在來犬調查計畫」手稿資料。岐阜大學田名部雄一教授是犬類遺傳學研究專家，他在2007年出版了人犬關係的書籍，包括探討日本犬的成立與特性以及其DNA遺傳分析。田名部雄一，《人と犬のきずな：遺伝子からそのルーツを探る》（東京：裳華房，2007）。

⁹⁰ 龔玉玲、鄭麗榕訪問，孔維國記錄，〈宋永義先生訪談逐字稿〉（未刊稿，2020年1月10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頁5。感謝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李順仁秘書協助安排本次訪談。

⁹¹ 林星輝，《臺灣國寶犬》，頁47。

⁹² 如臺灣在新紙幣與硬幣上圖案變更以及國定節日上變化，都呈現出更多臺灣的象徵。若林正文著，洪郁如、陳培豐、李承機、林果顯、林琪禎、岩口敬子、周俊宇、陳文松、陳桂蘭、顏杏如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423-431。

種「改良」與繁殖情形，文中所提的各種名犬，無任何一語有關臺灣本土犬隻或臺灣犬。⁹³ 但到了1986年5月，該刊即出版〈臺灣犬〉專文，提及因為日本專家來臺調查「臺灣原產狗」，造成「三千寵愛於土狗」，許多養狗者一聽到「臺灣土狗」四個字，耳朵都會豎起來。⁹⁴ 這樣商業炒作氣氛的形成，與當時臺灣即將邁向解嚴的時代背景以及專家的論述建構有關。特別是在1980年時記者討論的重點是「北京犬」等中國相關品種犬隻，而1986年時則已轉到「臺灣犬」並視其為臺灣特稀有動物。

專家學者的論述建構與自1980年代中期後，國立臺灣大學畜牧系教授宋永義常接受媒體採訪，傳播「臺灣犬」即將滅絕，並需「復育」的訊息有關。⁹⁵ 他親身參與日本學術團隊1966-1980年間兩階段調查，對後來臺灣犬熱潮的論述建構上有重要影響力。作為一位專業的農畜學者，宋永義精研家畜品種改良，曾繼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技正余如桐之後協助建立臺灣的種畜登錄制度。⁹⁶ 優良種豬全國登錄始於1975年5月1日，由養豬協會主辦，同時臺灣養豬科學研究所之種公豬中央檢定站（現稱北站）亦開始啟動，並有檢定合格種公豬之拍賣推廣。種豬的血統、性能與外貌，為登錄的重點，各豬命名的原則亦在表現其血統及特徵。⁹⁷ 在種豬之後，1990年代宋永義再協助建制臺灣乳用山羊的登錄制度。⁹⁸ 簡言之，宋永義是臺灣家畜動物純種論的研究及執行者，因參與跨國調查計畫，而接觸到臺灣本土犬問題。他也勤於將其品種改良專業與各方分享，例如曾到臺北圓山動物園演講「動物的生殖與不育」，因為新園（木柵）規劃中擬將獅虎驢馬等「動物

⁹³ 許麗慧，〈狗來富〉，《光華畫報》（1980年8月），「臺灣光華雜誌」，下載日期：2022年9月15日，網址：<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cb78159f-4e6d-470b-a14d-5f4d40c84dc3>。

《光華畫報》於2006年更名為《臺灣光華雜誌》，因此上述資料出處出現兩個不同刊名。

⁹⁴ 張靜茹，〈臺灣犬〉，《光華畫報》（1986年5月），「臺灣光華雜誌」，下載日期：2022年9月15日，網址：<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dfd5eee5-16ef-4d67-b4d8-490932c6140a>。

⁹⁵ 如金肇獻，〈臺灣犬瀕臨滅絕 純種土狗 力能搏山豬 缺乏保育 山地存碩果〉，《聯合報》，1984年12月10日，第5版。據宋永義說，這次採訪報導刊出後，他本人得到非常多的回應詢問，來自全臺十個縣市16封信，他都一一回覆。龔玉玲、鄭麗榕訪問，孔維國記錄，〈宋永義先生訪談逐字稿〉，頁1。

⁹⁶ 龔玉玲、鄭麗榕訪問，孔維國記錄，〈宋永義先生訪談逐字稿〉，頁15。

⁹⁷ 宋永義，〈種畜登錄的過去與未來〉，「臺灣畜產種原資訊網」，下載日期：2022年4月1日，網址：<https://www.angrin.tlri.gov.tw/lanyu/regisl.htm>。

⁹⁸ 〈臺灣乳用山羊登錄之父：宋永義教授〉，「臺灣畜產種原資訊網」，下載日期：2022年4月1日，網址：<https://www.angrin.tlri.gov.tw/goat/gfal6/gfal6p34.htm>。

雜交」當成是未來目標之一。⁹⁹ 他也和其他學者合作，參與持續將近十年的「製作迷你豬」研究計畫，希望將迷你豬利用於人類的心臟血管、牙科、眼科、內科、放射科、繁殖生理學等醫療實驗及應用上。¹⁰⁰

他視「臺灣土狗」稱呼較不文雅，而使用「臺灣犬」之名來談臺灣本土犬隻。他認為：日本有意消滅臺灣本土犬隻，因其勇猛善戰，日軍在山區與原住民作戰時深感頭疼，因此藉口防疫而大量撲殺。而戰後復因「缺乏育種與保護，又面臨淪為『香肉』的威脅」，因此純種臺灣犬在1980年代初僅剩百餘隻。他提及有「另一種嗅覺特佳的臺灣小型犬，則證實已經絕種。」可知戰後宋永義在社會習於使用「臺灣土狗」為名時，較早開始使用「臺灣犬」為名指稱臺灣本土犬隻，認為牠們原有不同類型，但日治時期的撲殺以及戰後來自中國大陸移民的嗜食犬肉，都使這些狗面臨滅絕處境。其說透過媒體傳播，被臺灣社會普遍接受。¹⁰¹

育犬組織更是推動命名的要角：1950年代中葉興起畜犬組織，至1960年代都還流行戰爭時期的軍用犬，以及逐漸發展作業犬（日治時期的使役犬）。1970年代獵犬、陪伴犬漸增，1980年代進入多元化發展，有小型寵物犬的繁殖買賣，也有特大型獒犬的發展，專業寵物店起飛，寵物美容師的培養走向企業化，在投資炒作下，品種犬培育買賣風氣大盛，而至1990年代上半，達到臺灣本土犬隻的市場高峰期。¹⁰²

在1990年代「臺灣犬」最盛時期，從《育犬月刊》廣告，可見到種犬配種費用一次高達5萬元。利之所在，育犬者從日治時期老照片及戰後日人主導的調查，各方逐步建構出臺灣犬標準，爭相培育，投入犬隻市場。在當時時空背景下，以回歸歷史傳統、保守國粹等稱譽為辭，尊稱「臺灣犬」為「國寶犬」，是臺灣人老祖先的好朋友，流著和先人相同生活習性的血液，是歷史的見證，也是臺灣文化

⁹⁹ 〈宋永義演講 動物之生殖〉，《聯合報》，1978年4月4日，第6版；〈動物園遷到木柵後 計劃進行學術研究 從事動物雜交實驗〉，《聯合報》，1978年4月9日，第6版。

¹⁰⁰ 〈把青春獻給迷你豬 黃添美詮釋豬如數家珍〉，《聯合報》，1984年1月4日，第7版。

¹⁰¹ 如宋永義接受《漢聲小百科》訪談時亦可見此一看法。〈九月十二日 國寶狗：臺灣犬 自然國寶系列（七）〉，《漢聲小百科》（臺北）9（1985年8月），頁60-61。

¹⁰² 臺灣犬界發展階段分期係參考中華民國畜犬協會等犬界人士之說，參見林星輝，《臺灣國寶犬》，頁72-73。中華民國育犬協會於1992年發表臺灣犬標準書，對於臺灣犬熱潮應有推波助瀾之效。協會發行的刊物《育犬月刊》在1992年至1993年間多次刊登臺灣犬特輯，臺灣犬的廣告在1992年時，也曾大幅增加至約占全部廣告的三分之一。

的尊嚴。¹⁰³

「臺灣犬」的命名程序，在畜犬組織歷經省、中央、亞洲及世界各種不同層級的認定。1988年臺灣犬界首次正式提出「臺灣犬」一詞及公布臺灣犬標準書，由臺灣省育犬協會(TKA)理監事會議通過而對外公開，英文名稱為Pure Formosan Dog。¹⁰⁴ 經過三年多，1992年再由中華民國育犬協會(CKA)修訂公布新的標準書。¹⁰⁵ 為推進國際犬壇準備，這部標準書也譯為英文版。¹⁰⁶ 標準書公布後，育犬組織舉辦各式比賽，勝出的犬隻得到肯定，也大大提高其市場價值，並獲得繁殖後代的優勢。其後於2002年元月，臺灣犬被亞洲畜犬聯盟(Asia Kennel Union, AKU)認定。而「世界畜犬聯盟」(Federation Cynologique Internationale, FCI)2004年11月9日初步接受，經過10年觀察，終於在2015年6月9日決議通過「臺灣犬」(Taiwan Dog)標準，使成為代表臺灣的全球新興犬種之一。¹⁰⁷

由於過去調查過程中對「臺灣犬」的描述多元，近年來的培育者是否有選擇性育種以及與過去觀點的歧異？這可能不是很容易討論的部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犬標準書也經歷了修改演變過程。1988年及1992年兩次公布的標準書中，可知被定位為獵犬出身的「臺灣犬」，能否適應一般家庭生活而成為馴服的家庭成員，也是經過更多的文字推敲：原先1988年版本說明「在家庭中被養之臺灣犬十分易與全家大小親和相處」，1992年新修訂版本則修改為「由於具有野生動物獨立自主的行為特性，因此很難像某些犬種可訓練到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飼養臺灣犬最好能放任與牠相處，就像家中的一員。」及至2015年通過的臺灣犬說明，則再修改為「對其主人極度忠誠、機警敏銳、動作敏捷、大膽且無所畏懼。」

¹⁰³ 林星輝，《臺灣國寶犬》，頁109-110。

¹⁰⁴ 林星輝，《臺灣國寶犬》，頁4、50。

¹⁰⁵ 林星輝，《臺灣國寶犬》，頁58、61。中華民國育犬協會(CKA)為全國性的畜犬組織，現在的臺灣畜犬協會(Kennel Club of Taiwan, KCT)前身，1991年加入FCI，成為國際承認代表臺灣的畜犬組織。「臺灣畜犬協會」，下載日期：2022年1月20日，網址：<http://www.kctdog.org.tw/info.html>。

¹⁰⁶ 林星輝，《臺灣國寶犬》，頁5、66-71。

¹⁰⁷ 〈我不叫「土」狗！國際認證正名「臺灣犬」〉(2015年7月22日)，《自由時報電子報》，下載日期：2019年12月1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387049>。〔按：以下省略下載日期和網址。〕FCI通過的臺灣犬標準書在臺灣畜犬協會(KCT)網頁上亦可查詢，除英文外也有中譯本。(下載日期：2022年1月20日，網址：http://www.kctdog.org.tw/custom_98632.html)然而，KCT的譯本多了一個序言，正式通過的英文本標準書只談中型犬，KCT中文本則從族群分布及地理環境，對臺灣犬作了北部山區、南部山區及西部平原與沿海三種系統的區別。

而近年建置的臺灣畜犬協會網頁，則又在序言中說明：「臺灣犬是一種聰明絕頂且順從性好的狗，隨時樂意取悅牠的主人。」¹⁰⁸ 從中可見，臺灣犬雖被定位為具有「狩獵、看守、伴侶」的功能，但顯非一般溫馴的寵物犬。

英文名稱前後也略有改變，從1988年的Pure Formosan Dog，到2015年確定的Taiwan Dog，除去「Pure」（純種）之形容詞，也更具體直接地將「臺灣」這個現在廣為世界所知的國名／地區名與此一犬種連結。

在2015年「臺灣犬」完成命名，成為經認證的新品種純種犬時，臺灣畜犬協會理事長施三德曾表示，感謝「臺灣犬」的愛好者以及會員幹部的堅持，歷經二十多年飼養管理、繁殖改良，另透過國內、外百位專家、學者、獸醫等協助，才能培育出瀕臨絕種半世紀的原生臺灣犬種，讓臺灣土狗躍居國際舞臺。¹⁰⁹ 亦即說明現有「臺灣犬」是經過專業人士（利用各犬種）培育而產出。雖然標準書中對於外觀有各項嚴格清楚的規定，育犬組織在實際認證作業上卻傾向寬鬆。2020年時，畜牧學者仍坦言，純種與否很難界定，即使DNA檢測也不一定準確。宋永義舉一個例子說明，1990年代臺北動物園規劃臺灣動物區時，曾提出合作計畫，要求他提供經保證純種的「臺灣犬」，他因認為有所困難而婉謝合作。這是畜牧專家對於純種血統說所流露出的誠實態度。¹¹⁰

2008年時，國防醫學院研究生胡光宇以基因研究法探討臺灣犬的親緣關係。他的研究方法是自從事繁殖的犬舍取得分析樣本，亦即透過臺灣犬保育中心嘯五峰犬舍取得26隻臺灣犬公犬檢體樣本。分析結果，認為這些經過純種認證的「臺灣犬」和其他亞洲地區的品種不相近，「顯示臺灣犬可能源自其他非亞洲品種或曾與其混種」，並發現「臺灣犬」的種緣關係與歐洲地區的品種較接近。該研究者總結說，其研究結果和臺灣曾有很多外來品種進入的歷史相符。¹¹¹

但對經歷艱辛復育歷程的育種繁殖業者而言，「臺灣犬」是代表臺灣的優良犬種，其「正統獨特原貌」是先民留下的自然珍貴外觀，已被國際育犬組織認證

¹⁰⁸ 〈犬種介紹 臺灣犬〉，「臺灣畜犬協會」，下載日期：2022年1月20日，網址：http://www.kctdog.org.tw/custom_98632.html。

¹⁰⁹ 〈我不叫「土」狗！國際認證正名「臺灣犬」〉（2015年7月22日），《自由時報電子報》。

¹¹⁰ 龔玉玲、鄭麗榕訪問，孔維國記錄，〈宋永義先生訪談逐字稿〉，頁16-17。

¹¹¹ 胡光宇，〈從Y染色體單體型探討臺灣犬的種緣關係〉（臺北：國防醫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為原始型狩獵犬。育犬者的願望及責任是依標準書的規範或犬種原貌照片來繁殖、管理臺灣犬，並以血統書詳實記錄犬隻血系，以保留臺灣犬原有外觀，並讓這獨特原貌世代傳承下去。¹¹² 亦即經過國際育犬組織通過，確定下來的犬種標準書，是所有愛犬家認識「臺灣犬」最重要的憑據；臺灣有許多族群的犬系存在，但有了標準規範，繁殖犬舍在繁殖管理犬種時，對犬種的獨特模樣、氣質就能明白掌握。從以上理路而言，在國際組織命名成功後，育犬者僅需依標準書進行培育，就可避免因人為好惡而產生的差異，可見申請命名並獲通過之重要。

至於育犬者對基因研究的看法又如何呢？育犬者陳玉山認為，使用基因技術判別檢測犬隻還在開發階段，雖已可判別部分犬種的品種別，但須取得該犬獨特遺傳基因標記，目前尚非一般畜犬組織普遍採用的方法。不過此一方法已常使用於親子血緣鑑定。將來「臺灣犬」獨特遺傳基因取得並建立基因庫資料後，基因檢定才能成為判別「臺灣犬」的新方法。¹¹³

雖然純種犬常被賦與特定國家本土色彩，但透過生物學研究及思考其歷史發展過程，「臺灣犬」作為純種犬的身世，似乎有更豐富而超越人們想像的多元故事深藏在其中。

六、結論

本文從品種觀談人們對本土犬隻的認識變遷，這是一個受近代新興觀影響而產生的新視野，從上述的探討可知，社會上普遍對臺灣本土犬隻的重視，是戰後甚至是1980年代後的變化。在日治時期雖已有畜犬專家引入相關品種觀，但都是較零星的看法，且主要置於軍事、保育脈絡，並且都由日人發聲，缺乏在地觀點。而戰後1960年代雖同因日本人在臺作犬隻調查而開始關注臺灣本土犬隻，但漸由臺灣當地人士參與，也與本地政治、社會、經濟背景息息相關，其歷程也反映了臺灣歷史不同階段的發展。

¹¹² 陳玉山，《臺灣犬：臺灣土狗的歷史、特質與復育故事》（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18），頁51。

¹¹³ 陳玉山，《臺灣犬：臺灣土狗的歷史、特質與復育故事》，頁50。

純種化對臺灣本土犬隻而言可能是一個想像。狗在家畜動物裡和人們有長遠密切的關係，在漫長的歷史中，牠們常隨著人們的移動，而與其他區域的狗混種變化。從自然環境而言，臺灣為一開放島嶼，島內外人群與生物都有不斷的交流情形。而傳統犬隻飼養方式，既無結紮等生育控制手段，也採取自由放養法，任犬隻在戶外自主活動，因此混雜化是自然且持續進行的現象。

因為狩獵的需要，臺灣原住民很早就畜養狗，視為家庭成員疼愛並予其行動自由。十七世紀中葉，荷蘭人為臺灣帶入了西洋獵犬。之後大批漢人移民來臺開發，也可能從中國大陸引入原鄉犬隻。日治時期臺灣本土犬隻所面臨的混血情境，變化或許更為劇烈，主因是休閒狩獵的需要，以及社會上的養狗文化，促使更多洋犬大幅移入。日本明治維新後引入洋犬，並因休閒式狩獵使用獵犬，而逐漸引入現代品種觀，幾乎完全使用洋犬以訂製混種出其所需要的獵犬，資產階級以飼養外來犬為富裕身分表徵。¹¹⁴ 在尊榮洋犬之風下，本土犬隻不受重視，亦無保存本土犬的想法。

日治初期，因狂犬病的流行，統治者以防疫為由，撲殺大批生活於戶外的臺灣本土犬。1930年代進行臺灣本土犬隻的初步調查，背景是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指定過程對於動植物等調查，以及軍方考量培育出適應熱帶風土的軍犬需求，而對臺灣犬隻有粗淺討論與認知。因當時已逐漸進入戰爭時期，以洋犬為主的軍犬培育，吸引了主要的目光。直至1970年代末，才因為臺灣學者與日本學者合作調查臺灣本土犬隻，並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臺灣政治經濟變遷，搭上臺灣本土化風潮，成為臺灣的象徵，大受媒體關注，育犬者也視復育「臺灣犬」為使命，並在二十一世紀完成畜犬組織的命名，成為國際認證的純種犬。臺灣犬隻從日治時期受忽略、負評多的情況，到成為一種尊貴的品種、國族榮耀的象徵，是在時代背景下，近代新式品種觀於臺灣本土犬隻的實踐。

但就人類學多物種民族誌的說法，臺灣原住民飼養犬隻實有其特有的文化觀

¹¹⁴ 以林獻堂家族而言，1938年林松齡在日本贈送林獻堂一頭 pointer 獵犬，其長媳曾珠如非常喜愛。但在1940年時，這頭愛犬「靡靡」，卻因善吠，擾人安眠而被送出。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6），8月14日，頁225。從照片史料來看，如黃旺成等出身新式教育的臺灣文人，家中畜犬也似具有較多洋犬的特徵。如黃旺成1930年代家族合照，睡在主人腳邊的家犬，呈現蓬鬆捲毛、垂耳等特徵；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二）一九三六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1），封面頁。

念，而其觀點卻常隱藏在握有權勢的專家、軍方人員之外而受到漠視。然而有趣的是，原住民所飼養的犬隻，卻又常被視為原種的臺灣本土犬。從品種觀來看，在原住民飼養的所謂「蕃犬」、「泰雅犬」、「布農犬」之外，有沒有漢人飼養的臺灣犬存在？為何近日日本人開始關注到臺灣本地犬隻的觀察時，不會以平地犬隻為臺灣代表性犬隻，而是向原住民部落尋求？這可能是因平地飼養的混種犬在當時已呈現出更多洋犬的外觀特徵，例如林獻堂、黃旺成等臺灣文人資產之家都沒有例外。

純種血統觀、現代犬的創造，受近代國家與社會影響很深。從國族角度來回顧臺灣本土犬隻被認識的歷史，會更進一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亦即在不同時期，相異國族基於各自標準，對臺灣本土犬隻評價不一，但也一致地反應了其心目中的族群中心觀。因此臺灣的人狗關係史，也某種程度反應人們的價值觀。不論在荷蘭、清代、日治時期，都有這樣優劣、自負的中心觀呈現。而臺灣本土化時期，本土犬隻的價值得到肯定，成為國寶、國粹，在市場上具有珍貴價值，也與國族意識的發展有相當的關聯。

另一方面，純種、血源之說既以外觀為重要準據，過去對於品種犬高度倚賴從外觀進行培育，但新科技的出現可能帶來新的挑戰。在「復育」過程，育犬者比對過去照片中的臺灣犬外觀據以重新培育，以使「臺灣犬」重返歷史。可是二十一世紀依生物基因研究法檢測一批被認證的純種「臺灣犬」，卻顯示牠們的血統與亞洲品種犬不相近，某種程度反映出純種犬還是有雜種化事實，臺灣犬的血統論未來可能需要加入新的論述。本文對於臺灣本土犬隻的研究案例，或許稍可增補過去品種犬研究僅偏重在進口犬所留下的空白，並呈現臺灣歷史中被忽略的一面。

引用書目

- 《中央日報》
-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 《漢聲小百科》
- 《臺灣日日新報》
- 《聯合報》
- 《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2186065、00003852084、00010401008。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龔玉玲、鄭麗榕訪問，孔維國記錄，〈宋永義先生訪談逐字稿〉（未刊稿，2020年1月10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 〈人類的忠實伙伴：獵犬、軍犬、臺灣犬概述 憲兵軍犬訓練〉，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典藏臺灣」，下載日期：2022年1月3日，網址：<https://digitalarchives.tw/Exhibition/2705/1.html>。
- 〈日本の洋犬史・その2 明治の洋犬たち〉，「帝國ノ犬達」，下載日期：2022年3月28日，網址：<https://ameblo.jp/wa500/entry-12251295559.html?frm=theme>。
- 〈台湾の近代畜犬史〉，「帝國ノ犬達」，下載日期：2022年3月28日，網址：<https://ameblo.jp/wa500/entry-11267879265.html>。
- 〈台湾犬界と戦争〉，「帝國ノ犬達」，下載日期：2022年3月28日，網址：<https://ameblo.jp/wa500/entry-11267879265.html>。
- 〈我不叫「土」狗！國際認證正名「臺灣犬」〉（2015年7月22日），《自由時報電子報》，下載日期：2019年12月1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387049>。
- 〈臺灣乳用山羊登錄之父：宋永義教授〉，「臺灣畜產種原資訊網」，下載日期：2022年4月1日，網址：<https://www.angrin.tlri.gov.tw/goat/gfa16/gfa16p34.htm>。
- 「公益社団法人日本犬保存会」，下載日期：2020年8月16日，網址：<https://www.nihonken-hozonkai.or.jp/>。
- 「臺灣畜犬協會」，下載日期：2022年1月20日，網址：<http://www.kctdog.org.tw/info.html>。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下載日期：2022年6月29日，網址：<https://who.ith.sinica.edu.tw/>。
- 日本「在来家畜研究会」，下載日期：2022年1月20日，網址：http://zairai.org/Zairai_report.html。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三）1648-1655》（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1654年7月1日、1655年3月11日，引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下載日期：2022年1月31日，網址：<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熱蘭遮城日誌>。
- 宋永義，〈種畜登錄的過去與未來〉，「臺灣畜產種原資訊網」，下載日期：2022年4月1日，網址：<https://www.angrin.tlri.gov.tw/lanyu/regis1.htm>。
- 林婷嫻採訪撰文，〈背後中箭、大啖貝類，史前南科住了誰？〉（2018年1月22日），《研之有物》，下載日期：2022年4月1日，網址：<https://research.sinica.edu.tw/southern-taiwan-science-park-archaeology-li-kuang-ti/>。
- 張靜茹，〈臺灣犬〉，《光華畫報》（1986年5月），「臺灣光華雜誌」，下載日期：2022年9月15日，網址：<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dfd5eee5-16ef-4d67-b4d8-490932c6140a>。

- 許麗慧，〈狗來富〉，《光華畫報》（1980年8月），「臺灣光華雜誌」，下載日期：2022年9月15日，網址：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cb78159f-4e6d-470b-a14d-5f4d40c84dc3>。
- ‘Canis lupus familiaris,’ “Animal Diversity Web,” accessed 1 Aug. 2022; available from https://animaldiversity.org/accounts/Canis_lupus_familiaris/.
- ‘Dog Map of the World,’ “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 accessed 1 February 2022; available from https://www.davidrumsey.com/luna/servlet/detail/RUMSEY~8~1~290358~90061904:Dog-Map-of-the-World-?sort=pub_list_no_initialsort%2Cpub_date%2Cpub_list_no%2Cseries_no&qvq=q:dog%20map%20of%20the%20world;sort:pub_list_no_initialsort%2Cpub_date%2Cpub_list_no%2Cseries_no;lc:RUMSEY~8~1&mi=7&trs=8.
- ‘Dog of all Nations Map,’ “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 accessed 28 March 2022; available from <https://www.davidrumsey.com/luna/servlet/detail/RUMSEY~8~1~272071~90045789>.
- “Taiwan Dog (348)” , 「世界畜犬聯盟」 (Federation Cynologique Internationale, FCI) , 下載日期：2019年12月1日，網址：<http://www.fci.be/en/nomenclature/TAIWAN-DOG-348.html>。
- 大阪毎日新聞社學藝部、東京日日新聞社學藝部（編）
- 1936 《天然記念物を探る》。大阪：盛文館。
- 大島正滿
- 1935 《タイヤルは招く》。東京：第一書房。
- 山本正一
- 1915 《警察犬の研究》。東京：朝香屋書店。
- 川西玲子
- 2018 《戦時下の日本犬》。東京：蒼天社。
- 仁科邦男
- 2014 《犬たちの明治維新：ポチの誕生》。東京：草思社。
- 木村泰治
- 1935 〈生蕃犬〉，《臺灣婦人界》（臺北）2(2): 63。
- 加林·艾林格 (Ehringer, Gavin) (著)、赵越 (譯)
- 2020 《离开荒野：狗猫牛马的驯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田丸亭之助
- 1915 《畜犬標準書》。神戸：田丸獵犬訓練所。
- 田名部雄一
- 2007 《人と犬のきずな：遺伝子からそのルーツを探る》。東京：裳華房。
- 朱仕玠
- 1957[1765] 《小琉球漫誌》，臺灣文獻叢刊第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吳政憲
- 2000 〈飄泊悲歌：臺灣流浪狗之研究（1895-1910）〉，《臺灣人文》（臺北）5: 219-245。
- 杉本正篤
- 1911 《養犬大鑑》。東京：長隆舎書店。
- 1936 〈臺灣産家畜に寄生する壁蝨の一新變種及一新種に就て〉，《熱帯農學會誌》（臺北）8(4): 336-346。

李若文

2018 〈殖民地臺灣的家犬觀念與野犬撲殺〉，《中正歷史學刊》（嘉義）21: 31-71。

谷口研語

2012 《犬の日本史：人間とともに歩んだ一万年の物語》。東京：吉川弘文館。

林占梅

1964 《潛園琴餘草簡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0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林星輝

1994 《臺灣國寶犬》。臺北：培琳出版社。

林欽傑

2020 〈馬與人交會的臺灣史：以輸入馬的風土馴化與利用層面為中心（1630-1945）〉。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

2006 《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約翰·柏格（Berger, John）（著）、吳莉君（譯）

2010 《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出版社。

約翰·荷曼斯（Homans, John）（著）、張穎綺（譯）

2014 《狗：狗與人之間的社會學》。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胡光宇

2008 〈從Y染色體單體型探討臺灣犬的種緣關係〉。臺北：國防醫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若林正文（著）、洪郁如、陳培豐、李承機、林果顯、林琪禎、岩口敬子、周俊宇、陳文松、陳桂蘭、顏杏如（譯）

2014 《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范发迪（Fan, Fa-ti）（著）、袁劍（譯）

2011 《清代在華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宮本佐市

1938 〈臺灣軍犬美談 傳令犬ゴール號〉，《軍用犬》（東京）7(7): 85-87。

陳玉山

2018 《臺灣犬：臺灣土狗的歷史、特質與復育故事》。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陳光祖

2006 〈綿狗小考〉，《臺灣史研究》（臺北）13(1): 219-256。

陳克裕

1966 《臺灣犬界》。臺南：中華出版社。

陳宗仁（主編）

2003 《世紀容顏（上）：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頭目、勇士及傳統工藝》。臺北：國家圖書館。

2003 《世紀容顏（下）：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日常生活、服飾、家族人物》。臺北：國家圖書館。

凱瑟琳·約翰斯（Jones, Catherine）（著）、黃英（譯）

2011 《狗：历史、神话、艺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湯淺浩史

2009 《瀨川孝吉 臺灣原住民影像誌 布農族篇》。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菲利普·郝威爾 (Howell, Philip) (著)、李鑑慧 (譯)

2020 〈一個「全球的」寵物史會是甚麼模樣？〉，《成大歷史學報》(臺南) 58: 1-20。

黃旺成 (著)、許雪姬 (主編)

2021 《黃旺成先生日記(廿二)一九三六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愛犬の友編集部 (編)

1961 《日本犬中小型讀本》。東京：誠文堂新光社。

1967 《改訂秋田犬讀本》。東京：株式会社誠文堂新光社，第5版。

鈴木秀夫

1935 《臺灣蕃界展望》。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之友發行所。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2007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調查報告書 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9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調查報告書 第二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蔡承豪

2018 〈臺灣獵狗進京去：從康熙朝覺羅滿保的奏摺談起〉，《故宮文物月刊》(臺北) 419: 16-25。

蕭瓊瑞

2014 《島民·風俗·畫：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圖像》。臺北：東大圖書公司，第3版。

蹄 枕

1937 〈畜犬の改良機運熟す〉，《臺灣之畜產》(臺北) 5(4): 14-15。

謝予騰

2021 〈夷洲是否為臺灣古地名再論：關於犬尾與犬毛〉，《成大中文學報》(臺南) 72: 79-110。

簡好儒

2002 〈寵物商品化與價值變遷：分析1950年代後犬市場的形成與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龔玉玲

2008 〈狂犬、名犬、流浪犬：臺灣現代社會如何面對狗的生物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Brandow, Michael

2015 *A Matter of Breeding: A Biting History of Pedigree Dogs and How the Quest for Status Has Harmed Man's Best Friend*. Boston: Beacon Press.

Ritvo, Harriet

1987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ott, Simon

2015 "Real People, Real Dogs, and Pigs for the Ancestors: The Moral Universe of 'Domestication' in Indigenous Taiw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Hoboken) 117(4): 693-709.

Skabelund, Aaron Herald

2011 *Empire of Dogs: Canines, Jap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mperial Worl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James

1980 *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Animals,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Victorian Mind*.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orboys, Michael, Julie-Marie Strange, and Neil Pemberton

2018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Dog: Breed and Blood in Victorian Britai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ecognition and Naming of Native Dogs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Animal Breeds

Li-jung Cheng

ABSTRACT

In 2015, the “Federation Cynologique Internationale (FCI)” certified “Taiwan Dog” as the 348th purebred/pedigree dogs, and clearly stipulated its standards. The background of this naming story chronicl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urebred dogs in the world for the past century. It also recounts both official and private investigations, records and changes related to native dogs in Taiwan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to the postwar period. The naming process was completed under transforming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aiwan.

The concepts of purebred blood animals and modern dogs have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modern Western countries and societies. Japan int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dogs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 of purebred dogs,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began using foreign dogs mostly as search dogs in the 1910s, leading to native dogs also being managed, recorded, and evaluated.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aiwan’s native dogs was launched in the 1930s, but became stagnated during the war with the emphasis shifted to foreign dogs, mainly military dogs. Not until the 1980s did Japanese and Taiwanese researchers reinvestigate Taiwan’s native dogs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way. Promoted by Taiwan’s localization and the atmosphere of commercial profit-seeking, the international naming application of “Taiwan Dog” was completed.

The breed concept was introduced by dog expert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ir views, voiced mainly by the Japanese, were sporadic and focused primarily on dogs in warfare and breed conservation. Taiwanese experts participated in the investigation from the 1960s. The naming history of Taiwan Dog also reflected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Taiwan’s history.

Moreo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s involved, Taiwan’s native dogs was recognized based on the standards of their respective race, and their evaluations of Taiwan’s native dogs reflected their ethnocentric perspectives.

Keywords: Taiwan Dog, Local Dogs, Taxonomy, Modern Dog, Purebred Dogs, National Identity